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少年哲学向导丛书

启蒙思想的光华
—近代俄国哲学掠影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穆志强，男，生于 1946 年。现为山东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资料员，职称是馆员。1970 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79 年转业。曾在《哲学译丛》等杂志上发表译文、资料十余篇，参加过《世界哲学家辞典》、《欧洲哲学范畴简史》等著作的编写和资料翻译等工作。现任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政治理论情报资料专业委员会理事。

内容提要

本书向少年朋友们介绍四位各具鲜明特色的俄国近代哲学家。罗蒙诺索夫物质不灭定律的划时代科学发现，对俄国哲学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起的开一代新风作用。拉吉舍夫奋不顾身地为社会革命制造舆论的先驱形象，对灵魂不死的精彩批判；赫尔岑那充满坎坷经历的一生，首倡革命代数学的绿色哲学，超群绝伦的政论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未来风暴年轻舵手的主帅风采，超越费尔巴哈，逼近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哲学大师的睿智，都将给小读者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前　言

众所周知，俄罗斯联邦以及前苏联是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国，俄苏民族对整个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世界历史的星空中，处处闪耀着俄苏民族的璀璨群星，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作家、诗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等层出不穷。同时，它又是雄踞我国北邻的强国，对我国的影响极大。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都会和它发生密切关系。在作为经济和政治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和世界观基础的哲学领域，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俄苏哲学思想的源头和演变过程以及它将如何发展，自然就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向少年读者们介绍近代俄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四位哲学家——罗蒙诺索夫、拉吉舍夫、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业绩及其哲学思想，以便使大家对这一时期俄国哲学史的发展有一个基本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前苏联学者一般把本国历史上溯到远古时期，而西方则把俄国史延伸到苏联。我国解放后习惯上把十月革命以前称俄国史，以后称苏联史。二者合称俄苏，如俄苏文学提法。这里依照惯例，提出俄苏哲学史概念，指的是从古至今的整个俄国和苏联的哲学史。尽管苏联目前已中止存在，但起码在最近一段不太短的时间内，这个提法仍然比较适用。

俄苏历史和哲学的沿革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本书所要介绍的四位哲学家活动的年代，属于其中的第二个阶段。在此之前，俄国已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此后俄国迅速强大，大大缩短了在各个方面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正如列宁所说，俄国的欧化“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经过一个多世纪，到 19 世纪后半期，俄国的蓬勃发展已经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后来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和发展壮大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这四位哲学家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以前俄国哲学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其精华所在。在整个俄苏哲学中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位置，在整个世界近代哲学中也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心目中，这些先驱的历史功绩和哲学思想占有特殊地位。正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列宁时所说的那样：“未必有谁受到过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车尔厄雪夫斯基那样的爱戴。他对这个人感到天然的亲近和怀着特别崇高的敬意。”青年列宁在流放时保存着一张有自己亲笔题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1883 年的照片。我们从列宁 1890 年出国后在国外创办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张全俄政治报纸《火星报》的实践活动中，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办《现代人》杂志的影响。

列宁少年时代就收藏有在国外秘密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他熟悉这部小说的详细情节。后来，他还用它来命名自己的一篇重要著作《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列宁在 1901—1902 年撰写的这部重要著作中阐明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等著名原理。

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个别等级的利益，多数等级的利益高于少数等级的利益。”显然，列宁的下述思想受到了先行者这一论断的启发。列宁写道：“指出这一点在

理论上也是必要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第 192 页）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继承发展人类历史上的优秀哲学思想的脉络。结合当前形势，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列宁提出的这一原理所具有的重要哲学、政治和道德意义。这有助于我们认清和平和发展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理解我们党提出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

因此，了解罗蒙诺索夫、拉吉舍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了解整个俄苏历史与哲学，对于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吸取对我国现实有用的东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山之石以攻玉，这就是笔者向少年朋友们奉献这本小册子的宗旨所在。

序

《少年哲学向导》是我们赠送给少年朋友们的一束智慧之花。

哲学是开在人类智慧之树上的最高花朵。它的许多道理都是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才提出来的。它的道理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道理要抽象得多，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因此，许多人觉得它高深莫测，甚至感到神秘，认为少年朋友根本学不了哲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确实是深奥的，但决不是高深莫测的，更不是神秘的。

哲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肩负的使命就是把人的思想从宗教神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它标志着希腊人已经开始抛弃宗教神话的思维方式，改换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考虑世界了。在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的产生也起到同样的作用。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宗教描绘的虚无缥缈的天国，而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它的内容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如实反映。现实世界中一切现象都有规律可循，根本就不存在神秘的东西，所以，在哲学中也不会有神秘莫测的内容。实际上，少年朋友在生活和学习中都会遇到需要进行哲学思考的现象。哲学不在天国，就在少年朋友身边。

我们已从学习对象方面回答了少年朋友能不能学哲学的问题。这只是回答了问题的一半。要使回答圆满，还必须回答问题的另一半，就是少年朋友有没有能力学哲学。现在我们想请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写了一本叫《哲学与童年》的书，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围城》作者钱钟书老先生把它推荐给三联书店，三联书店已经出版了中文版。这本书举了大量的例子证明幼童生来就有进行哲学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表现在幼童会提出许多带有哲理性的问题。马修斯把这些问题看成是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份请帖。这种能力还表现在幼童也会做哲理性的评论。幼童能够做到的，对少年朋友来说，当然更是不在话下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少年朋友的生活阅历和科学知识不断丰富。当代的少年朋友更今非昔比，他们都持有进行哲学思考的“请帖”，会提出更多更富有哲理性的问题，随着他们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能力的增长，他们也会做出更多更好的哲理性的评论。所以，对少年朋友来说，不是有没有哲学思考能力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去启迪它和发展它的问题。

对要不要启迪和发展少年朋友的哲学思考能力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对人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希望少年朋友中能够出现像马克思和毛泽东那样伟大的哲学家，但这不是我们帮助少年朋友发展哲学思考能力的主要目的，更不是唯一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使少年朋友生活得更好，学习得更好，将来工作得更好。哲学可以陶冶少年朋友的情操，使他们成为精神世界丰富和高尚的人。它可以帮助少年朋友把握好人生航船的舵轮，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都能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少年朋友掌握了哲学的思考方法，会如虎添翼，在学习、生活和将来的工作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人类做出突出的贡献。

可惜，我们家长、老师，甚至整个社会在对少年朋友的教育中，只注重灌输知识，忽视去启迪和发展他们的哲学思考能力，使许多少年朋友成为记忆的机器，而不是生动活泼的创造者。毫无疑问，少年时期应该多学些知识，

但是不应当把它们变成死的东西塞进少年朋友的头脑，而应当使它们成为活的东西，让少年朋友启动自己的头脑去主动地掌握它们。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应当传授思想方法。我们既要使少年朋友知识化，也要使少年朋友智慧化。学习哲学是锻炼思维、启迪智慧的最可靠的途径。

哲学是个大世界。在这里，既有自然规律的探寻、社会之谜的寻觅，也有思想面纱的撩拨；既有真的揭示、善的启迪，也有美的追求；既放射着西方哲学大师的理性之光，也迸发着中国哲人的智慧火花……这个大世界的方方面面，我们不能一一展示。我们力求把其中的精华奉献给大家。

智慧对人来说是最宝贵的东西。愿少年朋友都成为爱智慧和拥有智慧的人。

启蒙思想的光华
——近代俄国哲学掠影

一、罗蒙诺索夫：
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之父

1．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宗师

罗蒙诺索夫“本身就是我国的第一所大学”。

——普希金

18 世纪 20 年代，在闻名于世的俄国彼得大帝进行改革的岁月，白海之滨一户富裕的农民兼渔民家庭里，有一个如饥似渴地盼望读书，勤学好问而又因出身卑贱，被当地学校拒之门外的少年。谁也不曾想到，这位貌不惊人的平民家里的男孩子后来竟然成为大名鼎鼎的世界科学巨人，他就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

罗蒙诺索夫的家乡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霍尔莫戈雷附近的德尼索夫卡村就在北德维纳河入海口的库尔岛上。他的母亲是一个教堂执事的女儿，有文化。她常给小罗蒙诺索夫讲诺亚方舟和摩西等圣经里的故事。她还请了一个教堂职员教他读书。除此之外，罗蒙诺索夫还向有文化的邻居学识字。少年罗蒙诺索夫长得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看样子远远超出他的实际年龄。母亲去世后，他的继母不让他读书，让他随父亲出海捕鱼，当时他年仅 10 岁。可是他心灵手巧，学啥会啥，干啥像啥，而且遇险不慌，颇有大将风度。如果罗蒙诺索夫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子承父业，和家里给介绍的未婚妻结婚，那么他会过上不愁吃穿的日于，成为一个有出息的当家人。但他放弃了这种惬意的生活。他从家里的一位莫斯科来客那里得知莫斯科有很多学校，便下定决心外出求学。罗蒙诺索夫终于撇下了父亲，只身踏上了赴莫斯科求学的道路。这对于一个平民子弟来说，意味着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啊！

罗蒙诺索夫没有从家里带走分文，孤单远行，来到莫斯科。他不得不流浪街头，卖掉皮袄。为了排除巨大阻力就读，他只好隐瞒出身，冒充贵族。1730 年，罗蒙诺索夫进入斯拉夫——希腊——拉丁语言学院学习。这是曾由希腊学者约·李胡迪和索·李胡迪兄弟任教，于 1685 年开学的俄罗斯第一所高等院校，也叫柴康诺斯巴斯学校。罗蒙诺索夫在那里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学完了一年应当学完的课程，学校破例经考试合格后允许他直接到二年级学习。他还在图书馆里学到不少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那些生活富裕、贪图享乐的贵族子弟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后罗蒙诺索夫又到了基辅的基辅——莫吉梁学院。这是 1631 年由基辅的所谓“兄弟学校”改建的高等学校——教会学院。那里不仅讲授神学，还讲授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阐述的哲学和逻辑学。但是他在基辅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他遇到的只是有关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空洞争论。因为无法攻读物理学和数学，他在基辅仅仅住了不足一年，并把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阅读古代手抄本和斯拉夫文、希腊文及拉丁文的各种书籍。

罗蒙诺索夫在莫斯科和基辅生计窘迫。他在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谈到，迫使他脱离科学道路的力量几乎不可战胜。他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他弃家事学就意味着抛弃一切财产。贫困难以言状，他每天只有三个戈比（俄国货币，100 戈比等于 1 卢尔）的公费花销，用半戈比买面包，半戈比买酸酒，其余两戈比买纸、鞋及其他必需品。他这样艰苦而又勤勉地奋斗了五年，矢

志不渝地探索科学的奥秘。

作为全校知名的优秀学生，罗蒙诺索夫一年就学完了三年的课程。1735 年 12 月,他以超群的实力第一个通过了彼得堡科学院和语言学院领导共同的选拔考试。尽管有人以他实际上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而从中作梗，彼得堡科学院还是把他作为第一名学生优先录取。罗蒙诺索夫就这样和另外几位高材生被送到彼得堡俄国科学院附设的一所大学继续深造。1736 年，他又以天字第一号优秀生的身份和另外两位最有才华的学生被派往德国学习化学和采矿学等科学。当罗蒙诺索夫发现有人出于忌妒而造谣诬告他以阻止他出国时，他从那个人身上抢到了带有伪造罗蒙诺索夫签字的诽谤诗和诬告材料，从而粉碎了这个卑鄙的图谋。他在德国主要是拜唯心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克·沃尔夫为师。沃尔夫是 17—18 世纪之交的德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哥·威·莱布尼茨唯心主义思想的继承人和系统化者。

罗蒙诺索夫首先到了马尔堡。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既向自己的导师、马尔堡大学教授沃尔夫学习渊博的知识和分析事物的正确方法，也摈弃了沃尔夫的某些唯心主义和其他的错误观点，发表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他出色的学习成绩和崭露头角的罕见天才深受沃尔夫的赏识。当时这位俄国留学生住在一个教士遗孀家后面的小厢房里，并爱上了教士遗孀的女儿，最终和她结为终生伴侣。他曾经用如此美妙的诗句回忆过自己那段幸福的时光：

“尽管我并未失去
热恋中那股真挚的柔情；
但最使我欢欣的，
是英雄们的不朽光荣。”

和沃尔夫相反,罗蒙诺索夫到弗赖堡遇上了一位浅陋而又有所保留的‘导师”，这就是矿务顾问亨克尔教授。然而他研究了弗赖堡的银矿，并在和矿工们的交往中学到不少东西。由于亨克尔的刁难，他在决定离开弗赖堡前后遇到了生活上的困难。罗蒙诺索夫经莱比锡到荷兰海牙，就在返回马尔堡途中被强迫当了弗里德利赫国王的膘骑兵。这位浪迹异国他乡的俄国大学生从维杰尔古堡逃到了维斯特伐利亚的国土上。他返回马尔堡，和自己的心上人结了婚。但教士遗孀却没有把他当姑爷相待，他在经济上仍然毫无保障。正在这时，罗蒙诺索夫接到了彼得堡科学院的来信，让他迅速返回彼得堡。

1741 年 6 月，罗蒙诺索夫取道荷兰阿姆斯特丹乘轮船返回彼得堡。尽管身处祖国，但他在科学院仍然生计窘迫，事业无望。要不是他为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写了颂诗,他是不会在 1742 年 1 月 8 日就被授予副教授职称的！因为当时彼得堡科学院被沙皇政府请来的那些不学无术的德国人所把持。以舒玛赫尔为首的一批德国专家看不起俄国学者，甚至怕俄国学者的成长会影响他们在科学院中的地位。

科学院几次拒绝了罗蒙诺索夫关于建立化学实验室的请求，同时把他的学位论文寄给了瑞士数学家、理论流体力学的创始人列·欧勒。舒玛赫尔想借这位权威来压一压初出茅庐的副教授的“火气”。罗蒙诺索夫勇敢地回击了德国专家对俄国的诽谤，痛斥舒玛赫尔等人的劣迹。他为此而被哨兵监视在家达半年之久。

直到妻子从德国来彼得堡之后，罗蒙诺索夫才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1745 年 7 月 1 日颁发了恩准他建立化学实验室请求的谕旨，三周之后，又发

布了授予他教授（院士）职称的命令。这是他凭着顽强意志和周围敌人进行斗争取得的胜利，这是他多年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取得的胜利，这是俄国科学和教育取得的胜利！

1746 年 6 月某天的《圣彼得堡新闻》报刊登了罗蒙诺索夫用俄语发表演讲的简讯，这在俄国科学院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他讲演之后宣读了欧勒来信的俄语译文：“ 罗蒙诺索夫先生的全部论文不仅是出色的，而且是卓越的，他身上具有揭示物理和化学特殊现象的难得的天才。……我希望，全体院士都要这样去做，就像罗蒙诺索夫先生所做的那样，他的荣誉不仅是属于科学院的，而且属于他自己的整个祖国。 ” 舒玛赫尔无可奈何地承认，压制罗蒙诺索夫这个敢于以科学的态度向权威挑战的 “ 疯子 ” 的战争已经以失败告终。

罗蒙诺索夫创办了俄国第一个化学实验室。他在这个实验室里向大学生们讲授了关于认识大自然的课程。

作为一个知名学者，罗蒙诺索夫出席过宫廷招待会。会上宣读了欧勒的贺信，这位世界名人盛赞罗蒙诺索夫作为俄罗斯学者，已经具有超越其时代几十年的卓越思想。伊丽莎白女皇也曾御驾亲临罗蒙诺索夫的化学实验室，并且对宠臣说，我 “ 喜欢罗蒙诺索夫，正因为他热爱俄罗斯的一切 ”。

1755 年，在罗蒙诺索夫的倡议下，俄国创立了它的第一所大学，这就是后来以 “ 小联合国 ” 而著称于世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苏联莫斯科大学。

新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掌权后，便对曾受到伊丽莎白女皇优待的罗蒙诺索夫侧目而视。罗蒙诺索夫非常明白，便于 1762 年 6 月提出辞呈。但真正使他卸职休息的却是疾病，他仍然在卧榻上坚持工作。然而在这时却下达了有关他辞职的命令。为防不测，罗蒙诺索夫准备逃往乌斯特鲁迪查村。谁知叶卡捷琳娜二世又命令追回了有关他退休的命令，不久又恢复了他的全部职务。谜底由女皇自己揭开了，她去察看了罗蒙诺索夫实验室里的镶嵌工艺品和接近完成的巨幅绘画《波尔塔瓦战役》。她对这位学者的多种制品发出赞叹。然而罗蒙诺索夫却感到有一种冷漠的寒气吹来，女皇对他和他的事业不感兴趣。意大利波伦亚科学院选举他为名誉院士，以表彰他在镶嵌艺术方面所建立的功绩才是她此举的真实原因！

罗蒙诺索夫翻译了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大诗人贺拉斯的颂诗。其中写道：“ 我为自己制造了一种不朽的标志。 ” 罗蒙诺索夫本人就是这样，他病逝以后，在俄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都竖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罗蒙诺索夫毕生在彼得大帝下令创立的俄国科学院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冲破了当时沙皇政府、教会和盘踞在科学院的守旧分子、德国专家为他设置的民族和门第偏见等重重障碍，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他还被选为瑞士科学院院士。他是俄国和整个人类有史以来在科学文化方面最伟大的活动家之一，为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他是学识像百科全书那样博大精深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几乎闯进了人类知识的所有主要领域，在许多学科都有高深的造诣。在 18 世纪的科学中，罗蒙诺索夫像一座雄伟的山峰那样矗立着。伟大的俄国诗人、俄罗斯文学和现代文学语言的奠基者亚·谢·普希金曾经盛赞罗蒙诺索夫，称他 “ 是一个伟大的人 ”，“ 他创办了第一所大学，更确切地说，他本身就是我国的第一所大学 ”，他是 “ 新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是使科学发生剧烈变革并给科学指出今天应走的方向的人物 ”。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主战场，罗蒙诺索夫首先是伟大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他还通晓天文学、力学、机械学、数学、地质学、矿物学、冶金学、地理学等等科学技术领域内的知识。

化学是这位世界级学者涉足的第一领域。他在其中研究了原子论，最先区分出“微粒”（分子）和“元素”（原子）概念。他认为同类元素的原子能够组成同类分子。他还预见到同分异构现象。

罗蒙诺索夫是化学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他预见到物体化学成分的新规律，并且用原子假设的观点加以解释。他指出分子内部原子比例的永恒性应当表现为分解的化合物各个组成部分比例的永恒性。

1755 年，作为在化学实验中最先使用天平的人之一，罗蒙诺索夫证明，参加化学反应的物质的总重量在反应前后是守恒的。这就是说他发现了我们在中学课本中所学到的物质不灭定律，它是在化学领域中广泛运用的化学方程式的理论根据。物质和运动守恒普遍规律这一重大发现，是罗蒙诺索夫对人类科学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它不仅对化学，而且对物理学和整个自然科学乃至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物理学在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研究领域中坐第二把交椅。罗蒙诺索夫提出了热是分子运动的形式的理论。他还用分子运动的观点解释了空气的弹性和液体的蒸发现象。

作为物理化学这门科学的鼻祖之一，罗蒙诺索夫提出这样的定义：“物理化学是一门科学，他根据物理学的各种原理和实验去说明化学实验时混合体（化合物）内发生的一切。”

罗蒙诺索夫还对大气电、闪电和北极光等自然现象做出了正确的解释，设计了避雷器。他亲手设计制造了许多光学仪器和工具，研制了彩色玻璃和彩色玻璃镶嵌画。

1761 年，罗蒙诺索夫发现金星表面有一大气层，改变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观念，甚至使人产生了地球以外的其他星球也可能存在生命的遐想。

罗蒙诺索夫确定地质学是一门关于地球发展的科学，正确地提出地层是在自然界复杂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提出了关于海洋和山脉是由于地层的下沉或上升而产生的假说。

这位从小就对航海产生浓厚兴趣的海边渔民之子积极参加了俄国自然财富的考察工作，为了开辟一条到东方的通商路线，他对通过北冰洋的航海路线进行了研究。

罗蒙诺索夫不仅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也是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首先是文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历史学家、美术家，在诸多方面都有卓越建树。他实际上摆脱了宗教唯心主义的束缚，为俄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和继续发展，赶上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开辟了新的道路，他是俄罗斯唯物主义哲学之父。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哲学家别林斯基在谈到 18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盛赞罗蒙诺索夫在北冰洋岸边如北极光一样发出了光辉。俄国文学是从罗蒙诺索夫开始的，罗蒙诺索夫是俄国文学的父亲和养育者，是俄国文学的彼得大帝。

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文学语言的重大改革者和第一位俄罗斯诗歌的奠基人。他主张不同文体应使用不同范围的词汇。他还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他阐明了格律理论问题，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为新的诗律提供

范例，促进了俄国诗歌的发展。

罗蒙诺索夫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俄国文学语言应以俄语口语为基础，提出了创造全民族语言的任务。他为俄国文学语言规定的三种语体或风格（诗歌、散文、演说）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罗蒙诺索夫深刻批判了当时在彼得堡科学院的德国历史学家的谬论。他们坚持俄国—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北方人）说”，否认俄罗斯人民的独立生存和创造能力，否认俄罗斯人民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罗蒙诺索夫撰写了俄国古代历，发展了俄国历史编纂学。

正如罗蒙诺索夫的朋友和助手，彼得堡科学院的一位教授所预言的那样，在罗蒙诺索夫这位巨人广阔而深厚的知识海洋面前，笔者确实感到头晕了！这是一颗整个人类值得为之骄傲的头脑，它的全能，它的灵巧，它的高效，简直无与伦比！不仅如此，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科学和教育曾经屡遭冲击，知识几番贬值的现实面前，罗蒙诺索夫在科学的攀登中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必将鼓舞着我们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去为科学而献身，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献身！

2．大自然的真谛

“你和自然有着血缘关系，
而自然又是我的母亲。”

——罗蒙诺索夫

作为科学巨匠，罗蒙诺索夫在他的全部科学活动中，都坚持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看法，反对宗教唯心主义思想在俄国的统治。他首先要求把科学和教育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它们争地盘。他形象地写道，如果一位数学家想用圆规去测量神的意志，那末他是毫无常识的。而如果一个神学教员以为凭圣诗就能学会天文学和化学，那末他同样是毫无常识的。

这位科学家在关于大学拥有特权的草案中进而明文规定，僧侣不应当纠缠那些为大家的福利和教育而揭示自然界真理的学说，尤其不应当在传教时侮辱科学。他要求禁止教会干预科学教育。他倡议莫斯科大学把神学排斥在自己设置的系科之外。

罗蒙诺索夫强调化学和物理学必须广泛地运用理论观念，同时必须密切地和实践相联系。他把对经验的研究比作科学家的手，而把理论观点比作科学家的眼睛。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就像有手而没有眼睛一样，他们只能瞎摸真理。化学家必须掌握有关化合物变化的材料，还必须会证明、解释已经认识到的东西。这就首先要有哲学观点。他这样嘲笑经验论者把科学家想象为毫无理论思维能力的人：“难道一个化学家果真应当永远一只手拿着钳子，另一只手拿着坩埚，而且一会儿也不能离开煤炭和炉灰吗？”

罗蒙诺索夫竭力主张科学家应当经常运用假设。他认为假设在哲学这门学问中是允许的，有时甚至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方法。它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伟人获得在地上爬行的侏儒所无法获得的知识。正如列宁后来所说的，缺乏感情，任何对真理的探索都不会取得成功！

同样，作为实验自然科学最卓越的代表人物，罗蒙诺索夫也强调没有实验和观察，科学就不能存在。他强调，通过化学试验从几种物质中产生新的

物质，几乎是迄今为止发现一切化学真理的必由之路。他把事先未作任何试验而强加给科学界的抽象议论看作是空洞而虚伪的。他认为自然科学中最主要的物理学应当以可靠的知识为根据。

罗蒙诺索夫继承和发展了 17 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勒·笛卡儿提出的关于运动守恒的唯物主义原理，通过实验发现了物质和运动守恒的普遍规律。他在 1748 年致列·欧勒的信中把自己的这一伟大发现公之于世。他指出：“ 一个物体增加多少物质，另一物体就失去多少物质；我在睡眠上花费多少小时，我也就从不眠的时间中减去多少小时……这是自然的普遍规律，所以也可以推广到运动的规律上去：一个物体用自己的力量推动另一物体时，它从它本身的运动中所失掉的能量，就等于它所付给被它推动的另一物体的能量。 ”这样，罗蒙诺索夫就提出了物质和运动具有统一性的思想。

物质和运动守恒定律为唯物主义哲学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唯物主义的首要原理就是自然界一切现象的本质都是物质，它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这条原理在这一划时代发现之后，就从古代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永恒不灭的猜测变成了由实验证明的自然界的普遍规律。

这样就否定了关于运动是某种存在于物质之外的东西，是由“ 最初的神的推动力 ”、“ 第一推动力 ”等外力加在物质上的东西，运动可以消灭，也可以从无中产生的论点。所谓“ 第一推动力 ”，是由 17 世纪下半叶——18 世纪初的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伊·牛顿提出的。他认为行星按轨道切线方向运动，是在很久以前受到某种外来的“ 第一次推动 ”而开始的，以后行星才围绕恒星一直沿同一方向旋转下去。罗蒙诺索夫的发现对于 19 世纪的自然科学,特别是三大发现之一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及其以后 20 世纪的物理学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这位博学多才的科学泰斗对许多不同领域的自然现象进行了综合研究。他把它们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联系的。这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真正物理化学教程》中证明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因而研究这两种现象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他把自己参与创立的物理化学也称为化学哲学，认为它完全不同于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因为后者不仅不作任何解释，而且其中有关化学作用的实验也是神秘莫测地进行的。罗蒙诺索夫批评有些化学家不求助于物理学和其他科学，而只是片面地研究化学现象。他认为化学必须确定应该把物理学中的哪些东西吸收到化学中来，哪些东西和化学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两门科学更迅速地向前发展，并使它们都放射出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芒！他预言，以数学这门伟大的科学为基础，两门素享盛誉的最伟大的科学——物理和化学，将在对原子或分子的认识过程中融为一体。

罗蒙诺索夫在谈到物体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具有统一性的同时，提出了整个自然界所有物体具有统一性的思想。这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因于他所处时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水平，他所指的统一性首先是这些物体机械地相互联系。他把化合物分成有机物和无机物，这两类物体同时存在着相互间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统一性在于它们由同样的化学成分组成，服从共同的规律。差异性则决定于物体各部分之间存在不同类型的联系。有机物互相联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好似一个整体有其相同的成因。而无机物中的粒子，除了相互结合外，没有成因上的联系。在一定限度内把无机物分割开来，

它的基本性质保持不变，而把一个活的有机体分割开来，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如动植物体的纤维、导管、脉络以及在它们身上循环的各种液体都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整体。而包括矿物界的无机物就不是这样了。

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罗蒙诺索夫通过在密闭器皿中燃烧金属的实验精确地证明，即便不让外界空气进入，燃烧过的金属的重量仍与原来的相等，金属由于单纯受热而同样增加了重量。英国 17 世纪著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罗·波义耳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在发生化学变化时，某些物体重量之所以增加，是因为其他物体的部分物质归并到这些物体上。这就驳斥了燃素说。燃素说的哲学意义是在统一的运动着的物质之外，自然界还存在一种没有重量的非实体物质，它在燃烧时归并于实体物质或从其中分离出来，使之因此而起变化。罗蒙诺索夫确定燃素说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燃素是在客观现实中不存在的虚构。他还同样否定了关于热素、音素、电液和特殊光物质存在的类似假说，提出了世界的物质运动具有统一性的问题。

罗蒙诺索夫在他的《论地层》一节中表述了关于自然界经常发生变化的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他写道：“ 应牢牢记住，地球上的一切可见物体和整个宇宙，在创立之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整个宇宙发生过无数次巨大变化（历史以及同今日的地理学有关系的古代地理学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在我们时代，地球表面也还在发生变化。如果宇宙中最巨大的天体一行星和恒星都在不断变化，在天空时隐时现，那么，我们这个小小地球上的极为微小的颗粒——山脉（这山脉在我们眼中却是极为巨大的），能够不发生变化吗？ ”

他写道，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一开始就是造物主创立的，似乎不仅山脉、山谷和河流，而且还有各种矿物，都是和整个世界一起产生的。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去探究它们的内部特性和所处位置各不相同的原因这种议论十分有害于一切科学的发展。进行这种不费吹灰之力议论的哲学家只会背诵“ 上帝就是这样创造的 ”一句话，并用它回答各种疑问。它们对于如实认识地球，掌握采矿技术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在罗蒙诺索夫看来，运动是万物——从天体到最微小的物质粒子的不可分割的特性。他认为物体的不断产生和破坏充分证明了物质微粒的运动，微粒在活的和死的动物体中运动着，在活的和死的植物体中运动着，也在矿物体或无机物中运动着的，也就是说微粒在一切物体中运动着。他所理解的运动主要是指不同形式的机械运动。他谈到我们从昆虫身上看不到任何机械的东西。但实际上，昆虫也有机械部分，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推论一切微粒都服从于机械学的定理。

这位科学家断言物体的一切变化都是通过运动发生的。他认为物体的本性在于作用和反作用，如果没有运动，作用和反作用就不能发生。因此，物体是由运动决定的。没有运动，任何变化都不可能发生。

罗蒙诺索夫谈到整个宇宙都在发生变化。他写道，我们无疑可以根据这些原则对地球表面的状态、形状以及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层的情况作出结论或进行推断：它们在宇宙形成时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原来的样子。

罗蒙诺索夫第一次在科学史上试图用科学的论据去解释山脉、矿物、煤、石油、气候变化、动植物有机体的产生都是自然的，合乎规律的。

他认为生物按起源和结构来说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合乎规律的，受原因

和结果关系制约的自然现象。他说在有机体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组织和互相联系是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原因包含在和它有关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中。他还表述了各种自然因素尤其是气候对有机体发生影响的思想。

罗蒙诺索夫曾经试图这样解释在北冰洋地下岩层中发现热带动植物遗骸的原因：“地球球体在过去许多世纪中都逐渐改变着黄道和北极间的距离，而上述发现是整个地球球体逐渐倾斜的结果。……北极在古代曾是极炎热的地方，当时那儿正是大象及其他生活在赤道附近的动植物生长繁殖的地方；所以在该地找到这些动植物的遗迹，并不能认为是自然界的反常现象。”

3．开凿先河

“宇宙中我们所能看见的和一时还看不见的东西，都是物质……花岗岩是物质……人的眼睛同样是物质。”

——罗蒙诺索夫

以伟大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为其主要特征的，全能型的科学巨匠罗蒙诺索夫活动的主战场是自然科学，但他的丰富的哲学思想绝不仅限于这一领域，他在哲学范围内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自觉的、坚定的和全面的唯物主义者。

罗蒙诺索夫的前辈，特别是 18 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哲学家瓦·尼·塔吉舍夫和安·德·康捷米尔继承了俄国哲学长期发展的成果，力图解决彼得大帝改革年代的哲学和社会问题。

以 17－18 世纪初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约 托兰德为主要代表的西欧自然神论派别把上帝看作是世界的“造物主”，但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物，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他们主张用“理性宗教”或“自然宗教”来代替传统的天启宗教。塔吉舍夫与康捷米尔同这一派别一样，拥护科学进步，主张科学摆脱宗教和教会的统治，注重关于自然界的经验认识，批判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信条。他们拥护 16 世纪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和 17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哲学家伽利略在自然科学方面的革命思想，同时与 17 世纪法国哲学家反对经院哲学的言论遥相呼应，并且和 17—18 世纪某些西欧资产阶级学者一样，把自然法解释为人类理性的表现，是自然存在的，永恒不变的，是一切人共同的行为规范，解释为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蒙昧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但是他们还没有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还不能算唯物主义者。

罗蒙诺索夫继承并发展了他们的哲学思想，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了各种自然现象，在自然科学中没有给宗教神学留下地盘，尽管他在当时宗教和教会统治下的俄国还没有公开举起批判宗教思想体系的旗帜。他根据 17－18 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则解释当时带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同时发展了辩证自然观的因素，解决了同自然科学的进步密切相关的重要的认识论问题。这位俄国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为他的祖国的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为赶上领先于俄国近两个世纪的西欧哲学作出了不可估量的伟大贡献。

对物质这个基本概念作何解释，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分水岭。罗蒙诺索夫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持唯物主义观点。他把物质定义为“组成

物体的和决定物体本质的东西”。他举例说，我们奇妙的视觉器官眼睛的构成从空中摄取了光波，而耳朵奇妙的结构则能够摄取太空中的声音。如果把大自然和花岗岩的属性相比较，如果用想象的眼睛去透视眼睛和手触及不到的大自然的禁区，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物质形态之间还存在着更大的差别，但它们的原始结构却是同一的，它们都是物质。

照罗蒙诺索夫看来，一切物体都是由感觉不到的原子组成。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但是独立存在的。他把原子称作物质质点。他把广延，即占有空间看作是物质的基本性质，是任何物体，上至巨大的空中星球，下到最小的质点的基本性质。他还把不可渗透性，形态、惯性和机械运动也都看作是物质的基本性质。

伽利略和自称为机械论哲学家的波义耳以及 17 世纪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洛克断言，广延、形态、重量、惯性和机械运动是物体的第一性的质，它们才是客观存在的，表现了物体的实质。而气味、颜色、滋味、声音等属于物体的第二性的质，它们客观上并不存在，是由人们的感觉产生的。罗蒙诺索夫反对他们这种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认为不仅第一性的质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所谓第二性的质也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是自然界各种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他写道，第一类特性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物体作为基础的，而第二类特性是以最微小的、我们的感觉不可及的粒子作为基础的。他把第二性的质称为局部性的质，指出它的充分根据在感觉不到的物质粒子的广延、惯性、结构和运动中。

在研究酸性物质和酸味感觉之间的关系时，罗蒙诺索夫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唯物论的认识论结论：“舌神经上的酸性物质一接触到放在舌上的酸味质点便发生一种在运动上的变化，而大脑也便感到这种变化。嗅觉便是这样发生的。”这就是说，人的感觉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存在的物质现象作用于感觉器官的结果，是物体客观存在的特性在意识中的反映。

而在批评狭隘的经验论者轻视对观察和实验的理论概括时，罗蒙诺索夫又写道，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进行这么多的实验是为了什么，伟人们把自己的劳动和生命用在危险的试验上又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把许许多多物体和物质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眼看着它们如此众多而惊叹不已，但却不考虑把它们安排一下和整理一下吗？

罗蒙诺索夫根据自己的自然科学观点去解决理性的作用，即理论思维、理性认识的作用问题，他认为理性是人们洞察现象的奥秘和本质的强有力手段。他在《论地层》中写道，依靠理性探索大自然迫使我们摸不到看不见的地层深处，依靠思考游历地狱，依靠推断穿过狭窄的缝隙，把埋葬在长年黑夜中的昏暗不可解的事物和活动拿到明朗的阳光下来，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他提出寻求真理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观察制定理论，通过理论校正观察。

在自己的译著《实验物理学》的《题辞》中，罗蒙诺索夫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认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完全正确的错误观点。他批评他们只知道重复和转述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他认为，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对待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盲目崇拜权威的态度，是科学和哲学发展的主要障碍。即使是过去最有天才的哲学家的观点，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和一成不变的。无条件地拜倒在权威脚下磨灭了科学家们争先恐后地进行各种发明创造的热情。他高度评价笛卡尔是“第一个敢于反驳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人”，第一个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人。他最值得我们称道的功绩就是在于他鼓励学者们反

驳亚里士多德，为真理而进行斗争，从而开拓出一条自由研究哲学的道路，使科学更迅速地向前发展。

这位终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哲学家在感到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刻，认为自己做错了一件事。这就是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想写一本物理学著作，推翻他的导师沃尔夫的许多论点。但他一直不愿使自己的老师感到伤心。罗蒙诺索夫坦率地承认了已经来不及改正的错误，他发出了掷地有声的痛悔之言："在一切问题上居于首位的应该是真理！"

作为人类科学和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作为一代宗师的伟大学者，罗蒙诺索夫坚决反对人们把他叫作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或牛顿的继承者。他认为给他这称号等于否认他活动中的主要特征——创造性的本色，等于否认他解决新的科学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科学的事实，等于低估俄罗斯人民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罗蒙诺索夫自豪地并且完全正确地写道："不要把我称作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或牛顿。如果你们把他们的名字加在我身上，那么你们就会变成别人的奴隶，而我的光荣也就和你们的光荣一起消失了。"

4．心系人民

"我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把自己的知识献给我的人民。"

——罗蒙诺索夫

当少年罗蒙诺索夫立志识字学习时，他所喜欢的一个青年舵手曾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识字和学习各种知识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我们人民可真需要有学问的人呐。这位舵手还亲切地嘱咐他："喂，好小子，要长得结结实实的。你干什么都会成功的。学习吧，小伙子！把你懂得的一切都献给人民。人民会非常感激你的。"罗蒙诺索夫终生都按照这个大老粗的话去做了，这是人民对他的重托！

小时候，罗蒙诺索夫看到一个荷兰水手划着小舢舨，就问他爸爸为什么荷兰人到我们这儿来干活。当他爸爸说荷兰人比我们会干时，小孩子倔强地回答了一句："我们就不该比荷兰人差。我们一定能学会！"罗蒙诺索夫一生都是这样无比热爱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国，他深信自己的祖国一定会成为拥有最先进科学技术的最强的国家。

作为语言学家，罗蒙诺索夫同样无比热爱自己祖国的语言。他对伊丽莎白女皇说，俄语具有西班牙语的华丽，法语的活泼，德语的力量和意大利语的柔和，还具有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丰富多彩和描写上的简洁有力。尽管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但俄罗斯人民所运用的语言几乎都是相似的，这有助于各地人民互相了解。

尽管罗蒙诺索夫在社会政治领域还没有摆脱当时俄罗斯人民拥护"好沙皇"的幻想，还把自己消除俄国落后现象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尽管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错误地认为理性、教育、科学、道德是社会改造的决定力量。但是想人民之所想，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却像一条红线一样，贯串于俄国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的全部社会活动中。

出身庶民之家的罗蒙诺索夫，比起当时俄国的其他先进人物来都更加了解劳苦大众的疾苦。他憎恨不劳而获的封建农奴主寄生虫，认为一些人腰缠万贯，而另一些人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种现象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他

要求减少怠惰闲逸的现象，减少饮宴，减少酗酒。罗蒙诺索夫率先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以其创造性见解打破了封建思想的闭塞，为正在蓬勃兴起的俄国启蒙运动开辟了道路。和主张“开明专制制度”的俄国理论家们一样，也和西方先进的思想家、哲学家一样，他反对关于一切历史事件的“神的先定”和“最初的合目的性”的神秘主义理论，并且证明一切社会关系都具有自然的，世俗的性质。他论证了对18世纪俄国社会生活进行改造的必要性，重视普及教育和提倡道德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儿时被拒之学校门外的罗蒙诺索夫深知平民子弟求学的艰难，他身体力行地创办许多平民学校，允许非贵族家庭出身的孩子入学。这位在舒玛赫尔心目中“不驯服的教授”曾经愤怒地斥责舒玛赫尔的女婿，说后者管辖的科学院附属中学是“最糟糕的”地方。他要求清理国库拨给学生的经费。罗蒙诺索夫说，我参观了安置在简陋农舍的中学，玻璃全打碎了，冬天教室里墨水上冻，学生们冻得发抖、长疮、患病。他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在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为了改善中学生的命运，我过去奋斗过，我今后还要为之奋斗。

正像许多国家、民族的杰出人物那样，罗蒙诺索夫也首先强调国家民族独立的首要意义。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证了继续采取彼得大帝巩固俄国政治经济独立的各种措施的必要性。他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依赖外国而完全独立看作是俄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反对外国的狐群狗党在俄国国家和科学机构中横行霸道，主张为正在发展的工业、商业、国家管理事业培养本国专家。

罗蒙诺索夫致力于消灭俄国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现象。他认为本国工业、科学和文化的发达是一个国家的繁荣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主张发展国内外贸易，要求扶植工场手工业和发展交通运输，广泛考察本国的天然资源，以便发展采矿工业。他主张传播非宗教的知识，主张大力发展俄国工业，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使俄国赶上西欧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

当罗蒙诺索夫听到舒玛赫尔和自己的女婿谈论什么俄国离开外国学者和外国国务活动家就活不了时，他曾像他乡遇故知那样对自己的朋友慷慨陈词，说什么我们的祖国无力靠自己繁荣富强，离开外国人我们就活不了，而实际上，我国人民的伟大天资决不是无权、贫困和外国的影响所能压倒的。我们自己的俄国工程师们——建筑家们和发明家们，还有没有被发现的自学成材的专家们，犹如雨后春笋，不可阻挡地成长壮大，他们用自己的发现不断地在赶上欧洲的科学。

罗蒙诺索夫在自己的病情急剧恶化后，对前去看望他的一位院士说，最使他感到不安的是他提出的保护俄罗斯人民，使祖国繁荣昌盛的那些必要措施，至今仍没有一项付诸实践。他特别担心的是，虽然同普鲁士长达七年的战争结束了，并且缔结了和约，但是，俄国的敌人并没有睡大觉。我们不能失去警觉，在和平时期也应当坚持学习军事，以准备克敌制胜，保卫祖国。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俄国应当在所有强国中名列前茅。

这位启蒙思想家主张建立的国家机构，与彼得大帝的改革精神相吻合。他认为，国家应该由一个关心全民幸福，关心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关心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的开明君主来领导。他赞成当时西欧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力图以自己的科学研究帮助君主和执政者进行有益于国家的改革的作法。他用切身体会对封建的等级观念提出了批评，认为人的地位不应取决于爵位，

也不应取决于其祖先所曾建立的功勋，而只应取决于自己的事业。他在回首平生往事时批判了等级森严的错误观念。他指出，对于卑视我血统低贱的那些达官贵人来说，我好像是眼中钉。但是我不是靠幸运，而是靠天才、勤奋，靠忍受极端贫困，才赢得荣誉的。

罗蒙诺索夫抨击了当时俄国封建农奴制的种种弊端。这主要是农奴主、僧侣依仗特权欺压农奴；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死亡率很高；强迫婚姻；强迫入教修道；不关心劳动人民的子女；为地主和僧侣所幸灾乐祸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现象。

与主张“开明专制制度”的贵族思想家不同，罗蒙诺索夫绝口不提保护贵族特权问题，却尖锐地提出关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和物质福利问题。他认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他把促进俄罗斯民族的繁衍看作是最主要的事情，因为整个国家的富强不是决定于没有居民的辽阔土地，而是决定于人民的延续和生育。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罗蒙诺索夫主张禁止强迫婚姻，禁止未成年人结婚，禁止寺院接收 45 岁以下的女人和 50 岁以下的男人修道。他要求对人民实行有效的医疗救助，并为此培养本国的医师和药剂师。

这位出身社会下层的思想家痛斥了农奴主企图为自己的统治和占有农民劳动进行辩护，诬蔑农民智力和道德低下、酗酒、懒惰的谬论。他赞扬俄国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高尚的道德和伟大的创造力。他充满深情地强调，不能蔑视人民！当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诬蔑俄国下层少年并不需要教育和科学时，罗蒙诺索夫怒不可遏地迅速扯掉了院士服领钩，大声指责道：“我认为，这样的话当我的面说很不体面！”随即拂袖而去。

罗蒙诺索夫常常叱骂那些为了自己的舒适安逸而不惜牺牲人民幸福的执事僧侣，尤其是高级僧侣。他在谈及用冷水给儿童举行洗礼时，揭露了僧侣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说没有什么必要向粗暴的僧侣们解释什么物理学常识。他认为强迫用冷水举行洗礼的顽固僧侣们是杀人的刽子手，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意，希望出生和洗礼之后很快就是葬仪。

城市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遭受着农奴主和僧侣的残酷压迫，遭受着愚昧无知的痛苦煎熬，这使罗蒙诺索夫痛心疾首。他认为造成人民贫困的罪魁祸首是上层贵族和僧侣，譬如，他认为，疾病在俄国大量流行造成人口死亡率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沙皇政府不关心国民教育，不关心对人民进行医药救助和其他帮助。他写道，因为得不到医药帮忙，没有文化的普通农民和村妇胡乱给别人治病。他们常常采用他们所能想出的各种土方，同时还要算卦念咒。这不仅不能增强药物的作用，反而助长了人们的迷信心理。可憎的面目使病人心惊胆战，这只能促使病症恶化，使患者更快地走向死亡。

在罗蒙诺索夫的整个生命乐章中，处处贯串着爱国主义的基调。他像许多国家或民族的伟大人物一样，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把为祖国，为民族争光，作为自己矢志不渝努力奋斗的美好理想，作为攀登人类各个领域高峰的强大动力。罗蒙诺索夫热爱自己的母亲——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他深信自己的民族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他驳斥了那些否认俄罗斯人民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的外国历史学家的诽谤捏造，高度评价了俄罗斯人民的历史作用。他写道，俄罗斯民族自远古到现代，在自己的命运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变化，谁要是思考一下俄罗斯民族经历的那么多的内战和外患，必然会感到非常惊奇：尽管俄罗斯民族遭到那么多的分裂、压迫和

纠纷，它不但没有衰亡下来，反而成了非常伟大、强盛和光荣的民族。他还写道，我们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俄国并没有存在过像许多外国作家描写的那种极端的愚味无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祖先同我们的祖先对比一下，把各国人民的起源、活动、风俗和爱好对比一下，他们就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看法。

罗蒙诺索夫在关于俄国历史的问题上和德国历史学家展开过激烈的论战。他痛斥不懂俄语的德国历史学家不了解俄罗斯人民，不知道俄罗斯的伟大历史，却对俄国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大发议论。他愤慨地说：“这些瓦利亚基人（俄罗斯古代对北欧诺曼人所用的名称）和斯堪的纳维亚人都教了我们一些什么东西！缺了他们我们就完蛋不成？”他千方百计地保护俄国古迹和宝贵文献，力图避免让它们落入德国人手中。譬如，当他获悉有个德国人企图利用俄国古迹和文献后，就为夺回它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为在罗蒙诺索夫看来，不难得出结论，纵容这个畜生闯入俄罗斯历史古物中来，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害。

这位俄国科学巨擘深信，在俄罗斯人民中间将会涌现出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他们将和其他各国人民中间的天才学者一样，把科学推向前进。与煽起民族纠纷和仇恨的沙文主义者相反，他非常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对西欧的先辈和同时代人的成就给予很高评价，并且力图发展他们的成就。例如，他对笛卡尔和波义耳的评价，同欧勒、伯努利（瑞士数学家、流体力学和气体动力学家）等先进学者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为维护俄罗斯科学和文化进行了终身的斗争。他说，我把自己献给同俄罗斯科学的敌人所进行的斗争，我将同过去 20 年一样地斗争到停止呼吸为止。我从青年就开始从事维护俄罗斯科学的事业，到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停止。

在捍卫祖国人民利益和荣誉的斗争中，在必要的时候，罗蒙诺索夫甚至勇敢地反对过那些保护过他个人的显要大臣。对罗蒙诺索夫活动中的这一特征，普希金曾给予下面的评价：当问题关系到他的荣誉和他所热爱的思想的胜利的时候，他勇于坚持己见而毫不吝惜显贵们对自己的保护以及他自己的物质利益。看，他在给取笑他的舒瓦洛夫这位诗神的代表，罗蒙诺索夫本人在达官贵人中的培养者的信中是怎样写的吧：“阁下，不要说在大臣面前，就是在神老爷的面前，我也不愿作一个傻瓜的。”又有一次，在和这位大臣争论时，罗蒙诺索夫把他气得嚷道：“我把你赶出科学院！”罗蒙诺索夫自豪地说：“难道人们会让科学院离开我？”普希金最后说，瞧，这一位卑鄙的、颂诗和宫体诗的作家就是这样！

二、拉吉舍夫：
抨击沙皇专制的排头雁

1．口诛笔伐，奋斗终身

“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大俄罗斯人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

——列宁

18 世纪中叶，正当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统治俄国的时候，俄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革命家、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1749．8．20—1802．9．12）在莫斯科诞生了。他的童年是在萨拉托夫省库兹涅茨克县上奥布利亚佐沃村父亲的庄园里度过的。

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贵族，有两千个农奴，但对待自己的农奴比较宽厚。因此他父亲在普加乔夫农民起义（1773—1775）时受到了农民的保护。然而小拉吉舍夫听到过邻近地主对待自己的农奴像对待畜生一样，让农奴们在公共的食槽吃饭，动不动就残暴地鞭打他们。农奴制的暴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拉吉舍夫的启蒙教师是保姆和老家人。他们教他俄语，给他讲故事，领他到森林里采蘑菇。拉吉舍夫后来经常把这两个老农奴的形象写进自己的作品中。

拉吉舍夫七岁时，被送到莫斯科他舅舅家里，在莫斯科大学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贵族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宫廷政变上台，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加冕典礼。她在庆祝活动结束后，命令选送 40 名优秀贵族子弟到贵胄军官学校受训，拉吉舍夫也被选中。学员们其实就是少年宫廷侍从，因为他们必须学会宫廷礼仪和举止风度。

拉吉舍夫经常出入宫廷，对于女皇玩弄自由主义手腕，用伪善姿态迷惑农民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达兰贝尔、狄德罗等人，利用他们政治主张中的弱点，他是耳闻目睹的。宫廷中的穷奢极欲，谄媚逢迎，结党营私的丑恶行为深深地印在少年拉吉舍夫的脑海里。这为他后来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描绘沙皇宫廷打下了基础。

叶卡捷琳娜二世决定派遣 12 名留学生到德国去学习法津，拉吉舍夫又被选中。1766 年 9 月，他到莱比锡大学法律系学习。但他对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产生了广泛兴趣。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克·阿·爱尔维修的名著《论理智》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他还深入研究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其他西欧哲学家的著作。这对拉吉舍夫世界观和政治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拉吉舍夫积极参加了俄国留学生反对随行监督他们的皇帝侍从的贪污和体罚学生行为的斗争，这一事件使他认识到只有坚决反抗压迫者才能争得自由。

1771 年 9 月，拉吉舍夫离开莱比锡回国。他被安排在参政院当一名录事。他在工作中看到了司法的不公正。例如，一个女地主经常殴打女仆，把她折磨至死，法院只判女地主到教堂忏悔六星期了事。1773 年，他转到彼得堡城防司令部军事法庭任军法官。就在这一年，爆发了普加乔夫起义。1775 年 1 月，普加乔夫起义失败被处决后，拉吉舍夫愤然辞去军法官职务，他不愿充

当专制政府的鹰犬，选择了洁身自好的道路。直到 1777 年，他都没有工作。

拉吉舍夫和他在莱比锡的同学的侄女结婚后，不得不于 1777 年到商业委员会供职。他廉洁奉公，刚直不阿，受到主任委员沃隆佐夫伯爵的赏识。1785 年，拉吉舍夫获得四级弗拉基米尔勋章。叶卡捷琳娜亲自颁发勋章，受勋者一般都跪下从女皇手里接受勋章，唯独拉吉舍夫没有跪下。他认为，他获得勋章是凭他自己的功绩，因此，用不着向女皇奴颜婢膝。

1780—1789 年，拉吉舍夫开始做助手，后来又主管新建立的圣彼得堡省的海关工作。一个商人企图走私贵重织物，塞给拉吉舍夫一卷钞票，被拉吉舍夫赶了出去。这个商人又让自己的妻子到拉吉舍夫家去，给拉吉舍夫的妻子留下一包织物。拉吉舍夫发现这件“礼物”后，立刻命令仆人去追赶商人的妻子，把这包织物还给了她。

70 年代初，拉吉舍夫开始进行创作。当时俄国进步的社会思想的代表要求言论自由，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了控制舆论而于 1769 年创办了《万象》杂志。进步思想家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则创办了《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两种讽刺杂志。“雄蜂”字面上指不做任何工作的雄性蜜蜂，实际上是指靠别人劳动过活的农奴主。在《雄蜂》和《万象》的斗争中，拉吉舍夫坚定地站在《雄蜂》一边，而且比诺维科夫走得更远。

拉吉舍夫 1771 年回国后加入了诺维科夫组织的“印书促进协会”。1773 年，“协会”出版了拉吉舍夫翻译的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加·马布里著的《论希腊或希腊人幸福和不幸的原因》。他在其中为“专制”一词作译注时，把“专制”译为“独裁”。注文公开指出：“独裁是最违背人类本性的状态，‘我们’不能把支配我们的无限权力授予他人”。“法律授予国君惩罚罪犯的权力，国君的不公正使人民有同样的，而且是更大的惩罚国君的权力”。

1783 年，拉吉舍夫写了俄国第一篇革命诗歌《自由颂》。这篇颂歌充满了对于专制制度、农奴制的无比仇恨。作者突出了通过人民革命推翻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主题，把未来革命的胜利作为人类最伟大的节目进行描述，说到那时人民将欢天喜地，受苦受难的人将彻底洗掉自己的耻辱，人民将“登极”，自由将降临。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读了一段《自由颂》，愤怒的诗章使她暴跳如雷。她在批语中写道：“此诗显系反诗。对沙皇竟以断头台相吓，并举克伦威尔（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而歌之颂之。读此数页，即足见其犯罪逆之意图。应追究此诗作者，该诗用意何在。”接着她又写道：“彼既已直认不讳，乃为此书执笔之人。换言之，即彼已决心篡夺朕手中所执之王笏矣。”

1782 年 8 月 8 日，在彼得大帝纪念碑落成典礼时，拉吉舍夫写了《致居住在托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该文发表于 1790 年初，其中有一个正确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见解：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在位的帝王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力。该文的作者虽未说明夺取沙皇手中的政权该用什么方法，可是读者却一看就明白：这方法就是采用暴力。

叶卡捷琳娜二世已经看出拉吉舍夫是沙皇政体和农奴制的仇敌，是主张借法国的办法来铲除俄国沙皇政权的叛臣。她写道，此文（《致居住在托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亦为拉吉舍夫君所作，自文中着重之处，亦可窥见其思想早已趋向既定之途，而法国革命则促其成为在朕俄国活动之第一人。其余党亦尚须密切注意，不然彼等将再由自由法兰西，运来“假发”，有所图

谋。

1789 年 5 月，拉吉舍夫写完了著名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愚昧无知的警察局长雷列耶夫竟批准该书印行。后来他向女皇跪下含着眼泪说：“ 娘娘陛下，我错了 ”。叶卡捷琳娜饶恕了他。

拉吉舍夫在写这部著作时，热情洋溢而又异常勤奋，贡献了全部精力。1790 年他在自己家里印了 650 册。这部优秀著作曾有 25 册于 1790 年 6 月放在书商佐托夫的书店出售，6 册赠送友人。

作者选择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沿途的驿站作为书中各章的名称。但书中关于旅行者在路上的观感却描述得不多。每一章都着重说明农奴制度的某个侧面，倾诉农民的困苦、无权和地主的残暴，指出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书中描写农民一星期内要为地主服劳役六天或支付力所不能及的代役租。地主剥夺农民的土地，残酷虐待农民，用树条、笞杖、鞭子、多尾皮鞭抽打他们，把他们送去充军或流放去服苦役，“ 像牲口那样带着镣铐出售 ”。地主夺走了农民的一切，留给他们的只有无法夺走的东西——空气。拉吉舍夫主张消灭农奴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允许农民购买土地和自由出走、禁止不经法庭任意惩罚农民。拉吉舍夫还把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直接联系起来，指出专制制度保护达官贵人、世袭大地主的利益，保护农奴制秩序，因此，他号召推翻专制制度。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出版不久，叶卡捷琳娜二世读到了这本书。她从拉吉舍夫身上嗅出了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左翼雅各宾党人的气味。她说拉吉舍夫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叛逆。她派人把警察局长雷列耶夫叫来，又逮捕审讯了书商佐托夫。佐托夫供出了拉吉舍夫。叶卡捷琳娜下令逮捕了拉吉舍夫，并把他交给以残忍著称的刽子手秘密局长，拉吉舍夫被投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监狱。在女皇的亲自主持和指挥下，圣彼得堡省刑事法庭把拉吉舍夫当作要犯、国事犯审判。最后判决是剥夺官衔和贵族称号，收回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处以死刑。叶卡捷琳娜授意参政院判决拉吉舍夫死刑后，又改判流放伊利姆斯克（西伯利亚）十年。那里荒凉酷寒，“ 犯人 ”很难生还，因此，女皇的这一赦免实际上是阴险的谋杀。拉吉舍夫在被捕前一刻钟才知道情况不妙，吩咐他的仆人烧掉了全部存在家中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叶卡捷琳娜二世低毁拉吉舍夫沾染了法兰西谬说。她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许多页都批上了“ 大逆不道 ”。她极其憎恨拉吉舍夫，同时担心自己的命运。她写道：“ 又在此处攻讦皇室 ”，“ 其师承法兰西，藐视纲纪，居心何在，不难想见。作者肆意挑剔，诽谤朝廷，无所不用其极，” 拉吉舍夫说天下蠢事多半起于沙皇脑中，女皇对他更加深恶痛绝。她说作者不敬沙皇，唯有恣意之徒，始敢如此不逊。她还曾愤愤然写道，此书意图，已毕露于字里行间，作者迷于法兰西邪说，中毒颇深，竟极尽亵渎国体、诽谤朝廷之能事，且蛊惑百姓，使之于当今深表不满。她还谈到拉吉舍夫书中，涉及各项问题，遍布法兰西毒素。

1790 年 9 月 10 日，拉吉舍夫被押解着带病踏上流放险途。幸而有共事多年的保护人沃隆佐夫的关照，拉吉舍夫才少受了些苦。他以诗明志：“ 我依然故我，并将永远如此 ”，“ 开辟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 ”。这时拉吉舍夫亡妻的妹妹伊丽莎白放弃贵族家庭的优裕生活，来到了流放途中的拉吉舍夫身边。这使拉吉舍夫感激涕零，并和这位“ 具有英勇心灵的妇女 ”结合在一

起。这是万里探夫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的先驱。她们在历史上传为美谈，并为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所讴歌。

1792 年　1 月，拉吉舍夫抵达伊利姆斯克。在流放期间，他写下了《论人、人的死亡和不死》（1792－1796）这部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

1796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死后，她的儿子保罗继位。保罗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 人道主义者 ”，便把拉吉舍夫从伊利姆斯克召回，但只准他在乡下居住。在归途中，拉吉舍夫的妻子伊丽莎白又不幸病故。拉吉舍夫怀着深沉的悲痛于 1797 年 7 月回到卡卢加省他父亲的一处田庄涅姆佐沃村。他在那里的处境甚至比在西伯利亚更艰难，他被秘密监视起来，来往信件都必须经过检查。但拉吉舍夫仍然坚持写作。

1801 年 3 月 12 日，保罗被谋杀，涉嫌谋杀的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继位。亚历山大一世企图博得自由派沙皇的美名，允许拉吉舍夫回彼得堡，解除监视，恢复其一切权利，同时任命他为法律编纂委员会成员。

1801 年 9 月，拉吉舍夫回到彼得堡。他对亚历山大抱有幻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但是他不被信任。他想利用现有机会，通过立法活动来改善农民的境遇。他写了一系列“ 意见书 ”、“ 论法规 ”的札记，“ 民法草案 ”等等。他用比《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和《自由颂》要温和得多的方式，在立宪改革的范围内提出问题。拉吉舍夫谨慎地坚持反农奴制思想，要求言论自由，陪审官参加审判，废除肉刑等等。这些思想引起了他的顶头上司的不满和狂怒，他受到再度流放的威胁。这位饱经沙皇政府和农奴主以及他们专横的暴吏摧残和折磨的革命思想家彻底绝望了。1802 年 9 月 12 日，拉吉舍夫服毒自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沙皇专制进行了无比愤恨的最后抗争！他在临终前充满信心地预言：“ 后世子孙会为我报仇的。 ”

拉吉舍夫活动的年代，正值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和发展彼得大帝的事业，使俄国进入贵族的黄金时代，俄罗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在当时农奴制繁荣的条件下还没有产生能够领导人民实现革命的社会力量。但是他痛快淋漓地公开揭露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罪恶，以透彻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人民革命将获得最后胜利。他为俄国的社会思想革命奠定了基础。虽然他是远离人民的贵族革命家，他捍卫的却是农民的利益，并寄希望于农民。他在俄国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反对农奴制度。同俄国自然科学、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奠基者罗蒙诺索夫比较保守的社会政治主张相反，拉吉舍夫是同情 18 世纪俄国农民解放运动，具有强烈革命倾向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是俄国的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先驱。

列宁曾这样高度评价拉吉舍夫的革命功绩：“ 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好的祖国感到无比痛心。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这些暴行在我们中间，在大俄罗斯人中间引起了反抗；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70 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109 页）

赫尔岑在出版《旅行记》的序言中亲切地说，拉吉舍夫总向前看，他代表着 18 世纪末年的激进思潮，他的理想也就是我们和十二月党人的宿愿。“ 不论他写什么，我们叫能听到一种熟悉的琴弦、一种在普希金早期的诗作，在雷里耶夫的抒情叙事诗和在我们自己心头常常听到琴弦。 ”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也称赞“ 拉吉舍夫在我们这里，是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艺批评家和哲学

家）所后来居上的先进生活导师行列中的排头第一名”。

普希金大发感慨地写道，我们且回顾一下 1791 年，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的政治情况，如果我们还想得到我们政府的那种势力、我们那种自彼得一世（彼得大帝）以来未曾更动过的法律，以及这些法律的条令森严，如果我们想一想：在叶卡捷琳娜周围是些怎样残酷的人，那么拉吉舍夫的犯上，会使我们觉得是“疯子”的行动。“一个职位卑微的小官，没有权柄又没有后台，竟然举起武器攻打社会制度、攻打叶卡捷琳娜！”

他还用诗的形式歌颂拉吉舍夫：

“人民之所以对我如此亲近，
是因为我为歌曲取得了新的声音，
是因为我继拉吉舍夫而赞美了自由，
还曾经歌颂过怜悯和同情。”

2．为社会革命鼓与呼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把沙皇带上断头台处刑。”

——拉吉舍夫

与一般的启蒙思想家不同，拉吉舍夫的鲜明特色是作为贵族阶级的叛逆，用自己犀利的笔锋为未来的反农奴制、反沙皇专制的革命高潮进行舆论准备，他是俄国社会政治思想革命的先驱。

拉吉舍夫社会政治观点的理论依据是“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说”。后者宣扬国家和法都是由人们订立契约而建立的。17—18 世纪的欧洲自然学派以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为代表，认为人类原来处在“自然状态”，个人完全自由，经过自愿协议，订立契约，产生国家，个人放弃自然自由、生命、财产和政治自由才获得国家保障。它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武器，认为被统治阶级在其生命、自由和财产受到封建统治者侵犯时，有权进行革命，推翻政府，以恢复天赋人权。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政治学说。但是拉吉舍夫和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一样，他是用民主主义精神来阐述这种理论的。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这部 18 世纪俄国文学名著是拉吉舍夫的代表作，它开辟了俄国革命思想发展的新纪元。这是被沙皇列为禁书的造反檄文。

《旅行记》的卷首题词是：“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拉吉舍夫引用俄国十八世纪的著名诗人特烈季阿科夫斯基的诗句，并把三张血盆大口改为百张血盆大口，形象地抨击了俄国的专制农奴制。

《旅行记》是以旅行笔记的形式写成。旅行者经过的路线大体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 1787 年春季和夏季巡视俄国南方的路线。卖身求荣的官方作家利用“皇上”的这次旅行大肆歌功颂德。而拉吉舍夫则以他的《旅行记》揭露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真实情况：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反映俄国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旅行记》在 18 世纪俄罗斯文

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堪称“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愤怒地高呼，我们（指贵族）给农民留下了什么？只有我们无法夺走的空气。我们不仅剥夺农民地里的产物、粮食和水，而且往往要他们的命。法律是不准夺走他们的生命的，但那只是禁止一下子弄死他们。有多少方法可以把他们慢慢地折磨死啊！一方面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却是毫无保障的弱者。因为地主对农民的关系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又是他们自己所作的判决的执行人。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做原告，被告对他不敢说半个不字。这就是戴着枷锁的囚徒的命运，这就是套着颈轭犍牛的命运。

拉吉舍夫还叱咤农奴主说，野蛮的人！你不配叫作公民。若把耕作的人看作挽辔犁田的牛马，既使年年五谷丰登，对于国家可有什么好处？只顾我们的仓禀殷实，不管大家的饥肠辘辘，反而把这算作一个公民的享乐，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只对一人歌功颂德，不让万民同庆升平，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拉吉舍夫痛斥一个地主说，这个吸血鬼的财富不属于他，财富是掠夺来的，他应该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这位奋不顾身的英勇斗士在《自由颂》里用艺术形象表达了农奴制生产关系是俄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思想：

“在奴隶制死寂的黑影笼罩下，
结不出金色的麦粒；
在一切都使智慧厌恶的地方，
做不出伟大的事业。
肥沃的上地必然荒芜，
大小镰刀都没有用处，
犁田的懒牛睡倒在垄上，
光荣的利剑已失去锋芒，
密乃尔瓦神庙衰败破烂，
山谷中布满了阴险的罗网。”

（密乃尔瓦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是科学、艺术和工艺的保护者。——编者）

《旅行记》的作者写道，一个人生到世上来，就和别人完全一样。大家都有一样的四肢，大家都有理智和意志。由此可见，人如果不和社会发生关系，他就是在行动上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人的生物。由此可见，谁要想剥夺一个人被称为公民的权利，谁就是那个人的敌人。一个公民不论富贵或贫贱，他永远总是个人。一个人生在世上，他的天赋权利便是他的德行的永不枯竭之源，谁要剥夺他天赋的神圣财产，那就一定被判作罪人。

拉吉舍夫在《自由颂》的开端曾经这样热情地讴歌自由：

“啊，你是上天降下的馈赠，
一切伟大的事业都由你这儿发祥，
自由啊自由，无价之瑰宝，
让奴隶来把你歌颂夸耀！”

他在其中还写道，我在所有的权利中看到自己的一份，我为自己创造自由，也为别人创造自由，这就是社会的法律。

拉吉舍夫在俄国第一篇革命诗歌中还援引了克伦威尔的革命范例和人民对可诅咒的英国皇家政权的制裁，他深信俄国起义的人民迟早会在各地推翻

暴虐的专制政体，把沙皇推上断头台：

“战斗的队伍风起云涌，
希望武装了所有的人。
人人争用沙皇的鲜血
把自己的耻辱洗尽。
我看到处处是刀光剑影。
死神变化成各种幻影，
飞翔在沙皇高傲的头顶。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正把沙皇带上断头台处刑。”

但是这位贵族革命家也带有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他认为为了使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有可能利用改良的方式来改善人民的境遇，特别是通过地主们自愿地放弃阶级特权、放弃奴役自己同类的习惯。然而俄国和西欧的社会生活现实，农奴制引起的农民暴动的蓬勃高涨，沙皇政权对农民的残酷镇压，终于使他坚信只有运用暴力才能推翻暴君，建立新制度。他写道，啊，如果这些被沉重的枷锁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奴隶在绝望之中铤而走险，用束缚他们自由的铁锁砸烂我们的头颅，这些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呢？他们中间很快会出现一些伟大人物来保护受尽蹂躏的人们；他们是具有另一种抱负的人，他们没有压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幻想，尽管时间的厚密帷幕挡住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但我的视线已穿过这道帷幕！我看到了整整一百年以后的事情。

拉吉舍夫想象中的未来的社会制度，是以一个国家民族的自愿协商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形式。他认为在新社会中不应该划分等级，不应该有使广大群众濒于贫困的大私有制，但可以保留小私有制，而社会的财产也必须大致平均分配。由于俄国农奴制的落后，他不能认识到如果保留对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使是小私有制，也必然会重新出现阶级分化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他这样描绘自己理想中美好的未来社会：

“我使大海盛满船只，
我在岸边筑起码头，
让远方的奇珍异宝，
水流似地涌入都会的市场；
要使那金色的丰盛的收获，
永远对于耕作者有益；
那时他将对犁耙誓言：
我不是那片田地的奴隶，
我也不是我那个牧场的俘虏，
我只是因为你给我幸福和快乐。”

拉吉舍夫还以革命先驱的远见，向未来社会中废除了农奴制和君主专制的人民发出召唤，劝诫他们要日夜精心守护已经争得的自由：

“啊，你们啊，幸福的人民，
一次机会给你们送来自由！
守住这自然界美好的馈赠，
永远地把它铭记在心头吧。”

他还以无比自豪的心情，充满必胜信念地向未来一代享受自由果实，再也不受沙皇和地主凌辱的青年献词：

“但愿我今日歌颂的自由
使我冰冷的骨灰得到保佑，
但愿向往光荣的青年
来到我荒凉的坟前，
怀着崇敬的心情说：
‘他身为专制的阶下囚，
第一个向我们预言自由。’”

尽管拉吉舍夫的社会政治思想带有感伤主义的消极情调，带有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色彩，但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无疑是其中的主旋律。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拉吉舍夫比起未能超越“开明的君主制度”雷池一步的同时代的西欧启蒙运动者来说，要高出一头。

3．“灵魂不死与轮回”的批判者

“灵魂不是与肉体具长，与肉体一起发育、壮大，也一起凋落、枯萎的吗？”

——拉吉舍夫

拉吉舍夫革命的社会政治观点是同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他以当时的科学成就、罗蒙诺索夫和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传统为依据，同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共济会（一个秘密的宗教哲学团体，18 世纪起源于英国，后来分支组织遍及欧洲各国，是一个反对僧权主义同时也反对革命运动的反动组织）会员的神秘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展了唯物主义哲学。他的哲学思想尽管包含自然神论的成分，但锋芒直指教会的宗教唯心主义，具有旗帜鲜明的战斗性。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拉吉舍夫还没有脱离自然神论的窠臼。他把神当作宇宙的创造者，万物的最终原因，可以独立存在的无限。这是其唯物主义思想不彻底的表现。

在《自由颂》中，作者首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教会和沙皇制度一个鼻孔出气的密切关系：

“沙皇的权力保护宗教，
宗教确认沙皇的权力；
他们联合起来压迫社会；
一个为束缚理性费尽心机，
一个力图把自由消灭；
两者都说：为了公共的利益。”

他形象地把教士比作镣铐的发明家，认为人的理性随时受到镣铐的限制。教士剪去理性的双翼，于是理性就不能飞向伟大的自由。

作为灵魂不死与轮回宗教神秘主义理论的批判者，拉吉舍夫把“多愁善感”的人一想到死就恐惧，幻想长生不老看作是灵魂不死说法产生的原因。基督教徒和神秘主义利用人们的愿望来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人们在尘世生活中服从、逆来顺受，以求得来世幸福。而为贫困所驱使，为悲伤、疾病、痛

苦所逼迫的人们要寻求逃避现实生活的避难所，他们求助于灵魂不死，就更加不难理解了。

拉吉舍夫在批判这一观点时，把灵魂不死改换成精神不死。他认为精神不死能激励人们热爱祖国，为祖国造福，为人民造福，积极投身于现实斗争，不怕苦，不怕死，从而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永垂不朽！

拉吉舍夫认为凭实验方法，凭科学材料都不足以证实灵魂不死，灵魂不死的主要“论据”只有类比。他毫不怀疑人死之后会分解为原来的物质元素，返本归原，而这些元素将在别的机体中起作用。他在谈论人的灵魂时提出它们将根据我们所知的结合性质，和别的元素联接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机体。但他接着自问自答说，我想我是跑进臆断的境域来了，可惜臆断不是现实。他对和彼得堡及莫斯科的朋友们的分别，感到悲痛万分，因此假设灵魂不死，还用梦境和幻想来比拟所谓不死。他认为灵魂不死这一假设只是想象的结果，而不是可靠的，无可辩驳的事实。他说，也许我迷了路，但迷路却给我安慰，给我留下日后和你们聚首的希望；这宛如一个迷人的故事，它毫无真实性的根据，但描写的生动，文字的华丽，叙述的逼真却驱散了、冲走了心头抑郁的阴影，带来了想象，继想象之后又把我的心带进一个虽是幻想的、却又是愉快的和欢乐的天国。他强调灵魂不死不能自圆其说。

在《论人、人的死亡和不死》中作者对信仰灵魂不死的人指出他们的世界观违背自然科学常识。他强调他们希望死后再活下去非但不可信，而且不可能。他坚信灵魂必死和并无所谓来世。他说，注定要死的人啊！放弃你是神的所有物这一虚无飘渺的幻想吧！由于亘古长存的法则，你是大地所需要的一种现象，你的末日已匆匆来到，你的生命的长河断流了，对你来说，你的阳寿已尽，永恒世界已经降临。拉吉舍夫还曾引用公元 1 世纪的古罗马哲学家、新斯多阿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塞涅卡的悲剧《特洛埃妇女》第二幕中特洛埃女子合唱队的歌《特洛埃》里的几句话来证明灵魂不死的思想是错误的：

“死后一切变成无，
死亡本来就是无。
你想知道死后你在哪里？
就在出生前所在的那里。”

拉吉舍夫接着说，肉体的死亡一经来临，脑子也就随之毁灭。他问到那个昔日的你如今将在哪里？而你的特点、个性如今又在哪里？当下他就言简意赅地回答，相信你在死后一切都会消失，你的灵魂也将消失。他还颇有风趣地论证人类不仅肉体有死亡，而且灵魂也有死亡。既然思维需要有脑子，感觉需要有神经，那么妄想没有脑子和神经的灵魂也能发生作用，这是何等荒唐啊！灵魂是脑子和神经的产物，而脑子和神经又是注定要毁灭的。试问灵魂怎么能存在？

公元前 6 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歌拉斯及其信徒认为伟大人物的灵魂常由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那里。拉吉舍夫认为这种说法对我们的世纪是一种嘲弄。他说有人想用它来把谬误当作真理，把笑话当作真事。他接着说：“我现在正在踌躇：是否这些言过其实的论据竟也值得一驳；因为谁也知道，毕达哥拉斯若要证明灵魂轮回之说，他就得证明自己生于欧罗巴（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之前。”

作为 18 世纪俄国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拉吉舍夫在物质和意识

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唯物主义观点。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让你的思想驰骋，让你的想象飞翔，你既用肉体的器官思考，又怎能设想在形体之外还有他物？只要把你的空论从字里行间和抑扬顿挫中剥出来，形体便会在你面前暴露无遗，因为你就是形体，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是臆测。

拉吉舍夫以人体为例论证罗蒙诺索夫提出的物质不灭原则。他说，肉体死亡，继之以破裂，其组成部分即各各复原。但它们并未消灭，故而其作用并未中止。由此可知，存在之后，继之者并非所谓“无有”，同一理由，自然界本身既不能创造存在，又不能把物体消灭。

关于运动，拉吉舍夫这样生动地写道，当你眼望苍穹，看到光彩夺目的天体在旋转，当你环顾四周，看到千千万万个形状不同的生命分散各处时，难道你能说静止为物质所固有，而运动不是物质的本性吗？当自然界中一切东西都在运动，都在生存时，当最小的花粉粒子和最大的物体都在经受不可避免的改变、破坏和再组合时，难道你还能说只有静止而没有运动吗？既然你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在运动着的，那么谈论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把那些存在的东西看成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否是想入非非、异想天开呢？他接着说，太阳在光彩夺目地照耀着，火在熊熊燃烧，物质是运动着的，而静止只是不冷静的头脑想象出来的一种烟雾似的幻觉。

拉吉舍夫关于时间的见解是极其精彩的。他谈到很多人都有让时间慢点儿，哪怕只慢个把秒钟也行这种荒唐的愿望，但是时间却永无间断地奔流不息。在时间中，没有一个片刻可以被当作单独的一瞬，而在两个片刻之间；也不可能划出任何界线。它们并非一个接一个奔流，而是一个由另一个派生，它们所有的界线是统一的和共同的。短短的一个片刻可以分作几个片断，每段都具有时间的性质，但是在两个片刻之间，并非不可能再有第三个片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间作为运动的进程，何等紧凑，又何等绵密，以至我们的思想老是尾随其后，无法与之平行；因为你一想到某一片刻物体的状态，这一片刻已经过去，而你思想之时已是另一片刻，物体也改变了模样，那片刻也时过境迁了。

在认识论方面，拉吉舍夫同样坚持认为，我们的心灵或思维的力量，不是物质本身，而是构成物质的属性。他从唯物主义出发，把感觉看作是知识的来源。他谈到对于动物来说，听觉不是作为对外界有危险袭来的反应，便是作为因进食而得到的愉快的表现；而人却除此一切之外，还可以用声音表达他灵魂深处最细腻的情感，表达他的感触和情绪。只有人才能创造出格卢克（德国 18 世纪歌剧作曲家）和莫扎特（18 世纪奥地利作曲家）等的音乐。人之所以能达到创造音乐的地步，是因为他有极其细致和柔和的听觉。

拉吉舍夫这样深刻地阐明了感觉、感性经验对于概念思想的决定作用：并无一般的所谓植物、动物、人；而只有具体的植物、动物、人。我们的全部概念、推论、结论乃至最抽象的思想，皆植根于感性物象之中。

但是拉吉舍夫也非常清楚感觉有时会曲解自然。例如黄疸病患者把一切都看作黄色。大小相等的物件，其距离各不相等，我们看起来大小就不一样。但前者之因是有机体患病，后者之因则是远近不同造成错觉。因此，一旦发生错误，其罪咎不在于那永远不会欺骗我们的外界事物，而在于我们自己的错觉或偏见。但是谨慎和勤劳却可以使我们防患于未然，避免或减少错误。

拉吉舍夫热诚地相信人具有无止境地认识世界、洞察自然界秘密的能力。他对于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充满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写道，一

个人是如此变动不居，他使声、光、雷、电和太阳光都听自己的吩咐，他旋转千斤重荷，走遍宇宙的远极，他察看将来，预测将来；他是何等的足以自豪。古时这样的思想使得阿基米德（公元前 3 世纪的古希腊科学家）说出：只要地球之外有个稳固的支点，他就可以使地球改变轨迹。而笛卡儿也曾宣称，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可以创造世界。拉吉舍夫认为，人类探索科学的热情是永不知足的，追求名誉的渴望更是把整个世界看成是脚下的一块地毡。甚至我们的肉体也跟着思想，渴求无止境的遨游。

同自己的认识论思想密切相关，拉吉舍夫把人看作是物质的生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这样写道，万物之灵降临世界，它摘取了物质机体的桂冠，是大地的君王，但是它也是地面一切生物的同胞手足，不但是鸟、兽、虫、鱼、贝介、水螅的，也是植物、苔藓、霉菌、五金、岩石、泥土的嫡亲兄弟。因为不管它的机体多么灵巧，可是它的基本部分的构造法则却和地底下物质的构造法则一样。如果说结晶、五金或宝石的形成依据接触的法则，那末人体各构成部分的形成所依据的也是同一法则。拉吉舍夫还说当我们发现人的构造和其他生物相似，当我们指出人基本上和其他生物遵循同样规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贬低人的尊严。难道人还能是别的东西吗？人不也是物质的吗？拉吉舍夫的这些观点沉重打击了“ 上帝创造人 ”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想。

另一方面，拉吉舍夫也力求揭示人和动植物之间的根本差别。他反对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把人和植物等同看待的观点。他写道，我们不像某些空谈家那样声称：“ 人即植物 ”，因为即使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也仍然是无法估量的。他指出人由于能“ 直立行走 ”而和动物不同，这使人的双手解放出来。这样人就不必在地面上匍匐，却可以“ 眺望地球的边际 ”。他同意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的观点，即对于人来说，手是理性的向导。手的解放是人最突出的特点，人由此而形成了思考的能力。

拉吉舍夫同意 18 世纪先进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他猜测到生物机体要依赖它周围的外部环境。他接近于有机体在其生存条件影响下所获得的特征是遗传的观点。他谈到自然界是在以下这种情况下对人发生作用的。我们把动物安置在另外一种气候下生活，移居的动物很难习惯这种气候，但是它的下一代将比较适应这种气候，而第三代则可以说是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了，它的祖父在那里却被认为是外地来的。

正如整个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那样，拉吉舍夫的唯物主义也带有机械论的局限性。他把运动只理解为机械位移，曾经像牛顿那样假定过上帝的第一推动力。他不懂得认识的复杂性和辩证性，把人看作是被动的，在认识过程中消极接受外界的作用。他没有看到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而拉吉舍夫在自然观方面提出的辩证猜测也没有发展成为体系，他基本上还停留在当时进步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的范围内。

4．时势造英雄

“ 环境有时会毁灭伟大的天才；但是自然界始终不断地创造出伟大的天才。 ”

——拉吉舍夫

囿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拉吉舍夫并没有把唯物主义贯彻于社会历史观中。但是在他的唯心史观里，也不乏具有唯物史观倾向的深刻猜测。

拉吉舍夫片面夸大了人的意识、语言、社会舆论和教育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他常常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相信“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说”的唯心主义理论，用自然主义观点研究社会规律。

但是拉吉舍夫也像爱尔维修那样，猜测到“必需的需求”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他在《论法律》中写道，人一出世就和别人完全一样：孱弱、裸体、饥渴，因此，他的第一个愿望或天赋的责任就是寻找糊口之计和存身之处；他的第一个权利就是消费那些为了满足他的需要所必需的物品。自然界赋予我们的这种权利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取消，因为它是以必需的需求为基础的。如果我们有一瞬间忘记这个权利，我们的灭亡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自然规律的基础。

拉吉舍夫驳斥了当时被奴隶制农奴制度的理论家们当作武器使用的亚里士多德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界本身已经把人安排就绪：一部分人而且也是绝大部分人必定处于奴隶状态。在拉吉舍夫看来，奴隶制既不像亚里士多德所想的那样，决定于人类的本性，也不像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所推测的那样，决定于气候，而是决定于社会的历史条件。产生奴隶制的原因，或者是人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或者是人们处于迫不得已的情况，或者是缺乏经验，或者是反对合理提高人性的人施行了暴力。这些人用暴力和阴谋使人性处于盲从和受奴役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把理性和人的心灵变得软弱无力，因为它给后者套上了千斤重锁——卑视、对永恒的精神力量的压制。迫害者，危害人类的罪魁，别在这里替自己辩护啦，说什么这种可怕的束缚是一种要求人们俯首听命的制度。唉，如果你们尽可能深入洞察自然界的环节，那末会感到自己所想的将是另外一回事。

18 世纪的许多启蒙思想家认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偶然的。唯心主义者认为伟大人物是生而伟大。拉吉舍夫和他们不同，他把这种思想看作是干瘪和空洞的。按照他的见解，不仅要有自然环境，而且要有有利的社会环境，才能造就伟大的人材。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猜想，即在具备了伟大人物出现的良好条件时，在发生了相应的社会要求时，伟大人物才会在历史上出现，也就是说，时势造英雄。他在许多论著中证明，具有一定性格的伟大人物往往是在实际生活本身需要这种人的时候才出现的。他认为，叶尔玛克、拉辛、彼得大帝、罗蒙诺索夫、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胡斯、笛卡儿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各种历史环境造成的。如果成吉思汗和拉辛处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就不会是原来的成吉思汗和拉辛；而亚历山大也不会是希腊的国君，他也许会成为卡尔杜须（18 世纪巴黎著名大盗）；身为护民卿的克伦威尔显示出伟大的政治才能，譬如，他在战争中就表现出一个军人的伟大品质，然而如果把他拘禁在狭隘的修道院生活圈子里，他就会以擅于无理取闹闻名，而且常常会挨几下皮鞭。

拉吉舍夫这样谈到评价伟大人物的问题：对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人不能卑躬屈节，即使对我们所爱戴的人，也不能阿谀奉承。我们公正地评价伟大的人物，但并不认为他是创造一切的上帝，不会把他变为社会崇拜的偶象。因为真理是我们最高的神。他在高度评价罗蒙诺索夫难以估量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批评了罗蒙诺索夫颂扬伊丽莎白，向沙皇献媚。他鄙视沙皇，说不值得

用庄严的颂歌去赞美沙皇，甚至连三弦琴的叮咚声都不配。

在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社会历史观同时，拉吉舍夫对经济领域也是比较重视的。作为经济学家，他论述了俄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渴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关于同中国贸易的信》是拉吉舍夫应沃隆佐夫的要求撰写的一篇经济论文。他在其中认为首要任务是改善农民和猎户的物质福利，而并不在于富商巨贾和商务局获得的利益。他反对俄国人为贸易和狩猎而荒废农业。最使他感到愤慨的是收买商对西伯利亚农民和猎户的无情剥削。

拉吉舍夫写道，在一百人或二百人中间，才有一个人不负债，其余的人都是佣工，为他们预先支得的定钱劳动。他们的俘获物还没有捕获就已经卖了出去，可是贪得而又狠心的奸商却食人自肥，一天比一天发财。劳动人民的命运和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使这位战士和思想家慷慨激昂，情形一如往昔。他切齿痛恨农奴制和欺压农民猎户的剥削制度。

《我那个地方的情形》是拉吉舍夫自流放地归来后撰写的未完成著作。这位精通农业知识的专家在其中希望提高农业生产率，主张栽培新作物，采用新的育种、耕种和培育方法。他说若有可能，我就毁掉一切木犁。他还写道，若有人找到一种简便易行的省钱方法，把一切土壤变成黑土，他就是全人类的恩人，他跟教民稼穑的特力浦托勒密斯（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曾授人类以谷物，并教人类稼穑）或仙勒斯（古罗马传说中的女谷神）同样伟大。接着拉吉舍夫又愤慨地说，这样一位悲天悯人的守护神（古罗马传说中的精灵，专司一个人的命运，指引他行动的思想和方向），即使他来到世间，当局也不会看重他的劳作；这位给万物以生命的现代的赫拉克力斯（古希腊神话中以体力强壮闻名的英雄）将饱受歧视，被逐往天涯海角；平心而论，我们的当局简直愚不可及！

在这部著作中，拉吉舍夫从经济方面论证了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他流放归来也没有放弃反农奴制思想。农民的无权地位，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奴个人和全家被出卖，被强征新兵，被强迫婚姻种种现象，使他抱恨终天。在文章结尾，拉吉舍夫又写下了对俄国农奴制的犀利批评：“ 耕者无其田，劳者不得食，哀哉！ ”

正像罗蒙诺索夫和许多其他国家、民族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那样，像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那样，拉吉舍夫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早在 1771 年 9 月，拉吉舍夫作为俄国留学生离开莱比锡回国时，他就满怀爱国主义热情，渴望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祖国效力，急切地盼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当他们在归国途中“ 看到把俄国和库尔奥季亚隔开的国界 ”时，他们不禁欣喜若狂。这种“ 过分傻气 ”正是怀有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决心“ 为祖国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 ”的自然流露！

拉吉舍夫赞叹俄罗斯民族是“ 生来就伟大和光荣的民族 ”。他认为俄罗斯民族言行果断，而且持之以恒，勤劳能干，可以干出一番崇高壮丽的事业。她的独立创造力无穷无尽，她曾有过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而且还将谱写出更加威武雄壮的未来乐章。

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表示：他坚信俄国迟早要发生人民革命，将要造就大量人材，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他本人直到生命结束都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是俄国人民的忠诚儿子。无论是在铁窗里所受

的折磨，还是伊利姆斯克的长期流放，以及其他虐待与迫害，都没有动摇这位伟大的战士、启蒙学者和革命家反对农奴制的坚强决心。

十月革命后，胜利了的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拉吉舍夫这位革命的先行者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功绩。当时建立的第一批纪念像中就有拉吉舍夫的塑像。列宁亲自指导了它的建造。在 1918 年举行的拉吉舍夫纪念像揭幕典礼上，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卢那察尔斯基在群众大会上致词赞扬他“从头到脚都是革命家”，他的著作旗帜鲜明，使人们至今读来仍激动不已！

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还在《谈谈何谓祖国之子》一文中论证了什么样的人应算作祖国之子，即爱国主义者。他说并不是任何一个生在祖国的人都可以算作爱国主义者或祖国之子。他从“天赋人权”理论出发，证明暴君、民贼、权贵、农奴主、债主、骗子、凶手、强盗、浪子、懒鬼之流都不能算作祖国之子或爱国主义者，因为真诚的人和祖国之子二位一体。他说只有不计报酬，一心一意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人才算爱国主义者。

拉吉舍夫说，一个人最高的社会责任就是积极帮助祖国积累财富，使祖国变得更强大，更为世人所敬重。对于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来说，祖国的命运高于一切。他准备为使祖国繁荣昌盛而忍受任何一种痛苦和牺牲，献出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

他还写道，一个爱国主义者只知道为祖国服务，不计较个人地位的高低。他知道为祖国服务，就是使国家机体的血液循环流畅地进行。他头可断，血可流，决不丧失民族气节，誓做捍卫祖国荣誉的优秀儿女和栋梁之材。

拉吉舍夫认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应当精心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应当关心祖国财富的增加，科学艺术的繁荣和同胞生活的改善。他赞扬爱国主义者唯恐本国同胞的福利受到损害，把满腔热情都倾注于让祖国人民安居乐业；渴望祖国人民团结友爱。爱国主义者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起火一般的互爱之情；不惧艰险地去建立伟大的功勋；披荆斩棘，廉洁自重；上呈忠谏，下拯生民，救不幸者于迷途苦海；挺身而出，慷慨就义，为祖国的荣誉和强盛而不惜牺牲自己；为祖国而生，遵守天赋人权和国家法律；尽心尽力去肃清有玷于纯洁，有损于良知，有害于祖国同胞福利的一切。总而言之，爱国主义者光明磊落，灵魂高度纯洁，心地非常善良。这正是祖国之子的首要特征。

作为贵族阶级的叛逆，拉吉舍夫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刻骨仇恨，对农奴主刻骨仇恨，然而对于他的祖国，对于祖国的劳苦大众，对于农民却充满真诚的爱。他笔下的农家妇女的脸颊上浮现出健康的气色。皮肤虽因严寒酷暑的侵袭而显得粗糙，却有一种纯洁坦率的美丽。他把农村姑娘和贵族小姐进行了对比，说后者的内心深处是烟黑一片，而农村姑娘们则四肢粗壮，身材高大，没有被扭曲，没有受损害。他情不自禁地把农村姑娘称为“我的农村美女”，“我的农村美人鱼”。农民不仅身体美，心灵和道德也是美的。农村姑娘的爱情是纯洁而真挚的。而贵族的爱情则或者是虚情假意，或者是建立在金钱、地位、门第等基础上。

三、赫尔岑：
“革命代数学”的倡导者

1．坎坷的一生

“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列宁

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及其哲学的开创者、充满炽热个性特色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年3月25日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富有贵族雅科夫列夫家中。雅科夫列夫为他的这个私生子另取了一个姓叫赫尔岑，意思是“心的儿子”，并破例把他正式当作自己的孩子养育。当时正值法国拿破仑向俄国进攻的前夕。童年的赫尔岑把《火烧莫斯科》、《波罗的海战役》、《俄国人的英雄主义》当作自己的“摇篮曲”和“童话”。青年时代，赫尔岑怀有清高的、苦苦追求的浪漫主义幻想，他同18世纪德国剧作家、诗人席勒式的“伤感”产生了共鸣。但席勒的诗也呼唤他面向现实，他拜倒在“席勒式的强盗们”拉西姆·丰拉洛面前。赫尔岑一生都喜欢席勒，酷爱他的诗。他后来为《钟声》杂志起名，也正是受到席勒《大钟颂》诗歌的启发。

俄国战败拿破仑，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对赫尔岑革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1825年12月14日事件以及沙皇对举行起义的十二月党人的残酷镇压加速了他思想上的成熟。作为一个年仅14岁的孩子，赫尔岑就曾勇敢地发誓为被害者复仇。可以说，赫尔岑此后的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反对皇权、教权、暴政的伟大斗争！

1829年，赫尔岑考入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学系，1833年毕业取得硕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和他的同学与战友奥格辽夫组织了学习小组，研究18—19世纪之交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其他进步学者的著作，讨论社会上的各种政治问题，揭露和批判沙皇农奴制。赫尔岑因此获得了“贵族革命家”称号。他同时对哲学产生兴趣，并写了《论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分析》等论文，后者使他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和银质奖章。毕业前，赫尔岑曾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强调了哲学的科学方法论意义：“我在大学里学到了方法，而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最主要的工具。”

1834年夏天，赫尔岑和奥格辽夫被捕入狱，罪名是宣传革命思想、圣西门主义和“唱禁歌”。1835年3月宣布判决，赫尔岑被流放到比尔姆，后又转移到瓦特加和弗拉基米尔城。尽管他在这一时期同虔信宗教的未婚妻查哈琳娜相识，染上了一些宗教色彩，但以后又对此自嘲和自责。他亲眼看到农民所受的苦难，感受到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更加憎恨农奴制度，坚定了推翻农奴制度的决心。这促使赫尔岑以后积极投身于反对农奴制的活动，成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早期领导者。

赫尔岑回到莫斯科后，立即加入到以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及其哲学的另一开创者，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为首的俄国先进分子的友好团体中。1841年，沙皇政府以赫尔岑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为借口而再次逮捕了他，并将他流放到诺夫哥罗德城。赫尔岑在信中揭露彼得堡的一个岗

警手持凶器进行抢劫，杀死了路上的行人，从而触犯了沙皇政府。在这次流放期间，赫尔岑深入研究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英国哲学和法国哲学，特别是深入地研究了黑格尔哲学，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了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这一著名命题。1841 年 6 月至 1842 年 6 月，赫尔岑读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他在《往事和随想》中写到阅读这部著作时的兴奋心情：“刚看完第一页，就激起我的兴奋。伪装被剥去了，含含糊糊的隐语也被抛到一边，我们就是自由的人，我们不是上帝的奴仆，也不需要在神话中接受真理。”1842—1843 年，赫尔岑以极大的热情写下了《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这部他自己最主要的哲学著作。他在 1843 年 2 月 4 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写作这本书时的心情：“我开始写作哲学中的‘英雄交响曲’，我渗透着这样的感觉，我是以火一样的激情写这本书，这就是我的诗。科学问题总是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我所要讲的每句话都是肺腑之言。”1845—1846 年，赫尔岑写了《自然研究通信》这本书，标志着他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从贵族革命家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极其生动形象地指出：“人只是在饥饿的驱使下，在强烈的需求下，才来到科学这一公开的人类餐桌前。”列宁曾这样高度评价赫尔岑在《自然研究通信》中表述的哲学思想：“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济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实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17 页）

赫尔岑早就打算创办新的杂志，但一直未能如愿。1844 年 11 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出版杂志的许可证还没有弄到手，看来是没有什么指望了，这最后的幻想破灭了。我遇到的办事人员都是冷冰冰的，他们只想着吃喝，不愿意办事，真是寸步难行。为了创办新杂志，摆脱沙皇的书报检查和农奴制俄国死气沉沉的氛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赫尔岑克服重重困难，借口妻子有病而于 1847 年 2 月移居法国巴黎。当时俄国发生了一连串事件，照赫尔岑的说法，俄国专制主义政权感到欧洲发生的事情既可恨又可怕，变本加厉地镇压一切进步的思想运动。因此他决定继续留在国外。目的在于使“我们的言论和自由刊物可以不受书刊检查的掣肘”，实现“在国外为祖国人民出版俄文书刊”的夙愿。1849 年，他在《论文集的代序或提要》中向俄国政府提出挑战：“我们的书或者打入俄国，或者被俄国政府封锁在国外，究竟谁能取胜，大家走着瞧吧。出版自由万岁！”

赫尔岑对法国怀有浓厚兴趣，把它看成是革命思想的源头。他曾为圣西门和 18 世纪与 19 世纪之交的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说所吸引，之后又受到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路易·勃朗和普鲁东的影响。1847 年以后，他察觉到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冲突后，对自己以前未加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行性产生怀疑。1848 年欧洲革命运动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这次革命的目击者，赫尔岑还参加了 1848 年罗马和 1849 年巴黎的示威游行。他亲眼看到法国革命的失败，看到革命人民遭到残酷镇压，受到更加野蛮的剥削和压迫。这一切粉碎了赫尔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使他陷入了精神破产的状态，他无可奈何地发出死亡万岁的叹息，并坚信西方老人濒临绝境。赫尔岑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欧洲现行的制度无法解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他在《马利尼大街的来信》中写道，尽管法国用五光十色的政治装饰品打扮自己，但不能长久地掩盖内在的病疴：它已经严重地分化了。赫尔岑认为只有实行根本的经济变革，即实行 1793 年提出的社

会主义，法国才能复兴。他写道，资产阶级唯一关心的就是利息，为了捞到好处，他们可以不顾一切。资产阶级把人类的崇高感情兑换成“叮当响的钱币”，根据金钱的多少和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序，用算盘“杜撰出自己的道德观念”。

1850 年，赫尔岑断然拒绝了沙皇政府让他回国的要求，他和自己的家人加入了瑞士国籍，居住在佛连堡的夏德里村。1853 年，赫尔岑在波兰政治侨民的帮助下，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把渴望变成了现实。

1855 年，赫尔岑创办了《北极星》辑刊。《北极星》原来是雷列耶夫（1796—1826，十二月党人、俄国诗人）编辑的一本文集的名称，封面印着林通画的五位被绞死的十二月党人侧身像，这本文集遭到尼古拉一世的查禁。赫尔岑编辑的《北极星》于 1855 年 8 月出版了创刊号。他本来打算每年出三辑，但由于困难重重而未能如期出版。赫尔岑对《北极星》的出版感到欢欣鼓舞，他这样形象地解释自己抱有这种心情的原因：“要知道，从 1848 年到 1855 年，我们的文学就像莫扎特的《魔笛》中的人物一样，一直在用被锁着的嘴歌唱”

1857 年，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又出版了俄国第一份自由的杂志——《钟声》。它的卷首题词是：“我召唤生存者！”这个题词出自席勒的《大钟颂》，赫尔岑把它理解为行动的召唤，斗争的召唤。《钟声》最初是《北极星》的增刊，但很快就具有独立性质，尽管从 1862 年 1 月 1 日第 118 期才取消作为“增刊”的副标题。但它从 1858 年 2 月 1 日已经开始由每月一期改为两期，并且把篇幅由 8 页增加到 16 页。

《北极星》第二辑发表了一位不大出名的作者从国内寄来的信，其中写道：“您（指赫尔岑）的《北极星》在彼得堡的上空升起来了，我们向它致敬。从前，有一颗明星照耀着诞生自由的摇篮，维夫列姆（ВИФЛеeМ）的牧羊人向它致敬。我们也是如此。假如您能看到有人那么痴情地阅读《北极星》，抄录上面的文章，谈论上面的内容，复述您的佳句，一定会给悲伤的流亡生活带来一丝安慰。……青年一代渴望得到言论自由，对您深表同情，他们的心灵是高尚的。”这位作者在来信中附上他抄录的赫尔岑写的《莫斯科和彼得堡》一文，以此表示“我们多么珍视您的文章”。

赫尔岑在《钟声》第　110 期上发表了《巨人醒来了！》一文，其中写道，从我们伟大祖国的四面八方，从顿河和乌拉尔，从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发出越来越大的呻吟，怨言沸腾起来了；这是能引起风暴的，在可怕的使人厌倦的风平浪静之后鼎沸起来的海潮咆哮的前兆。赫尔岑把人民的力量比作俄国神话当中的勇士，他呼唤着：“喂！睡梦中的勇士，您该醒来啦，该醒来啦！勇士！早安！”他用“海潮”、“风暴”象征群众运动，表明人民群众中“孕育着革命风暴”。

这两种杂志秘密传入俄国，传播了革命思想，启发了俄国知识界和广大人民的心灵。列宁赞扬“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 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沉默被打破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419 页）

但是由于赫尔岑长期离开俄国，对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刻的理解，对工人阶级缺乏正确认识，不相信革命人民，所以也发表了不少乌托邦式的意见。例如把农民理想化，认为俄国在农村村社的基础上

可以直接建立农民社会主义，主张劝说沙皇和地主废除农奴制度等等。1858年《钟声》第一期上发表了赫尔岑的《再过三年》一文，标志着他的自由主义摇摆性发展到了顶点，他为沙皇辩护，为其大唱赞歌。这是一封“甜蜜的信”，读来令人作呕！赫尔岑以高昂的笔调写道，我们已经不再是同尼古拉朝廷的继位者打交道，而是同开创俄国历史新纪元的强有力的活动家打交道，他就是12月14日继位尼古拉·亚历山大二世。他同我们站在一起，为伟大的未来而努力工作。亚历山大二世的英名将彪炳史册！下一代将不会忘记，从他执政之日起，农民开始获得了解放。赫尔岑动摇于革命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原因在于他出身于贵族，是一个贵族革命党人。尽管他在50年代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正如列宁所说，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他身上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185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亲赴伦敦，说服了赫尔岑，使他放弃了自由主义观点。1861年，沙皇惨无人道地镇压了别兹得纳村的农民起义，在事实的教育下，他终于彻底摆脱了贵族革命家的动摇性，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当赫尔岑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处七年苦役的消息时，气愤地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判处七年苦役与永久流放。政府、上流社会、卖身投靠的无耻文人们干下的这种卑鄙勾当真是令人发指！有一些可怜的人、草木一样无知的人、软体动物一样的人，却说什么不应当咒骂统治我们的那一伙强盗和败类！他颇有感慨地叹息道：“我们十年前曾向之致敬的朝廷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赫尔岑同时经常向青年一代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者致敬，他曾郑重地把平民罗蒙诺索夫推崇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先驱。19世纪60年代，赫尔岑认为新一代革命者已经成熟，坚信“思想不会中断”，盛赞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

由于赫尔岑站在“农民社会主义”立场上，再加上巴枯宁从中捣鬼，所以他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赫尔岑动摇于革命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和宣扬无政府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巴枯宁合作，结果使得马克思把他当作泛斯拉夫主义者。1869年，赫尔岑在逝世前不久写的题为《致老友书》（即致巴枯宁书）中曾劝巴枯宁“不要转向自由主义，而要转向马克思领导的国际”。这表明赫尔岑已经认识到第一国际是工人的世界，已经完成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折。他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国际应当在使人民群众挣脱剥削与压迫的解放运动中起特别重要的作用。1869年赫尔岑给奥格辽夫写信时谈到，我对于马克思学派的全部敌意都是因巴枯宁而引起的。他在晚年欢迎马克思这位在社会主义事业上功勋卓著的人物，开始承认西欧的社会主义是从工人运动中生长起来的。

赫尔岑于1870年1月21日在法国巴黎与世长辞。不久，他的遗体依照本人遗嘱移往尼斯，埋葬在地中海之滨。

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对他的一生作了总的评价：他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竟能达到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超过了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赫尔岑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沙皇君主制度的第一人。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政治家、文艺评论家）赞扬赫尔岑的《致老友书》蕴藏着巨大的思想力量，把他称为“革命的预言家”。列宁还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这篇文章中把“当时以赫尔岑的《钟声》杂志为首的未经书报检查的一般民

主主义报刊”看作“是工人报刊（无产阶级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报刊）的先驱。”（《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98 页）

2．充满活力的“绿色”哲学

“黑格尔哲学（按指黑格尔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它不同寻常地使人得到解放，并且彻底摧毁基督教世界，摧毁旧世界。”

——赫尔岑

赫尔岑集哲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他极其厌恶“包装纸一样的晦涩的哲学术语”，这种术语读起来味同嚼蜡，不知所云，使人昏昏欲睡。他的哲学著作不仅内容新颖，而且形式富有激情，通俗易懂。他运用对话、独白、通信体裁，通过艺术形象、现实画面速写、肖象手法以及对比、比喻技巧妙语连珠地阐明哲学思想，使哲学理性与文学直观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他用生活之树的常青之色把“灰色的”哲学理论染成了象征生命的绿色！

这位语言大师首先形象化地表明自己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见解：“自然界就像古希腊的雕像，她的所有的内在力量，她的全部思想性，她的外形，所有这些，她都能自己表现出来。她向人类表明，她是独立存在的……”

大学时代的赫尔岑就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信念。但在流放时期精神寂寞的重压下，这种非常脆弱的信念发生了动摇。赫尔岑受到神秘主义者维特堡夫妇和宗教情绪强烈的女友查哈林娜（后与赫尔岑结合）的影响。他在狱中读过《圣徒传》，附和查哈林娜的宗教信札。后来赫尔岑投身于反对农奴制的斗争，接受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影响，最终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

赫尔岑把人类的产生和自然界的发展比作一部小说的两个章回，比作花朵与茎萼的关系，青年与婴儿的关系。显然，前者是后继者，而后者才是先行者，前者是由后者长成的。

这位唯物主义者无情地嘲笑黑格尔主义者：“难道生存着的个人是从种族的概念里发生的吗？”他这样论证：“如果没有自然界，没有肉体，那么人的意识，就成为那样的思想，就是它既没有用以思想的头脑，又没有引起思想的物象。”

赫尔岑讽刺德国唯心主义者认为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哲学上毫无建树的观点。他说德国人把语言通俗当作浅薄，他们习惯于汗流浃背地捧读哲学论文，而一旦碰到没有让他们头脑欲裂的书，他们就会认为看这样的书太无聊了。

关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联系，赫尔岑这样强调，如果失去这种联系，哲学就要陷于抽象，而严正的科学就要葬身于事实的深渊。“不根据专门科学，不根据经验的哲学——是幽灵，是形而上学，是唯心论。流离于哲学之外的经验——是文集，是词汇，是帐目，否则它便不是忠实于自己的经验。”

在批判机械唯物主义者割裂事物间相互联系的片面性时，赫尔岑首先指出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或一堵无法翻越的石墙。使全体分类学家大伤脑筋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一般并没有止境和界限。

赫尔岑批判机械唯物论者想把头脑变成一个被动的容器，一面特殊的镜

子，它毫不改变地映出事物对象，也就是照出其全部偶然性而不摄取其内容，他们简直愚蠢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为了表明自己的哲学同机械的庸俗的唯物论迥然不同，赫尔岑把它称之为“现实”哲学。

对唯心主义的要害理论脱离实际的形象的深刻批判，无疑是赫尔岑唯物主义哲学最精彩的篇章。他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这篇重要哲学著作中揭露唯心主义者在科学上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像僧房里的和尚那样，是科学中的佛教徒，只会念书诵经，毫无真知灼见。他们只有离开地面上的一切生物，在无限之中寂灭，进行抽象思想才心安理得。赫尔岑生动地描述思想知识不会隐身在学院的大门里面，或者藏在学者的书库里与各种毒素同处，反之，它们急切地想抬起脚步由单纯进行表演的前台投身于现实生活中的后台，发挥自己的作用。

赫尔岑尖锐地指出：“思想如同信念，离开事实就要死亡”。他把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叫作“暧昧的德国二元论”，指责它“使生命的常绿树干枯”，不研究自然和社会，只用一些事先想好的现成公式硬扣在生活的各种场合上面。赫尔岑进而非常正确地强调理论与实际最好的结合就是革命。他大胆地预言：“我们的世纪要求在事变的现实世界里起一个革命的转变。”

正像历史上的许多哲学家那样，赫尔岑也必然带有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阶级的局限性。他把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混为一谈，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把自己的哲学叫作“实在论”。他常常把唯心论等同于唯理论，把唯物论等同于经验论。他甚至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是历史的误会，号召双方悬崖勒马，互相理解，克服各自弱点，并试图创立一种把唯物论的经验论和唯心论的辩证法结合起来的新的所谓“现实”哲学。

诚然，我们不能忽略，赫尔岑是在沙皇专横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发表自己的哲学著述的。尽管赫尔岑自己觉得在克服哲学语言的晦涩性方面并不总是成功的，但当有人责备他用语难懂时，他还是要替自己辩白，说自己需要使唯物论思想躲过沙皇的检查，这才给哲学著作披上羞羞答答的外衣，否则它们就不能问世。赫尔岑抱怨在封建士大夫当权的国度里“每一个把写作当作使命的人都得使用他的才能来掩蔽自己的思想；我们的全部才能都得耗费于用奴隶式的构思和假定的词句来掩蔽自己的思想。”他还一针见血地揭露：“故弄玄虚，歪曲本意，叫读者自己猜想……当然，‘这是对暴力的一个讽刺’”。

同自己的唯物论相比，赫尔岑关于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这句名言，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的革命精神。他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把它和唯物主义和农民革命斗争的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把概念的辩证法变成为消灭封建农奴制服务的实际的辩证法。他强调概念的辩证法是由‘物质的辩证法”派生出来的，并且因此才成为一切科学和哲学的起点。

赫尔岑具体地阐明了事物的联系、运动和发展。他写道，如果把自然界当作某种僵死的东西而使它停住一瞬间，那就不可能有思维，甚至也不能有纤毛虫、海藻和鲜苔。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是处在运动中，它有广阔的天地，有自己的发展史，它只是展现在联系中。

这位著名的辩证法家举例说明物质的特性不仅限于形而上学所归结的那种广延性。当物质发酵时，它就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否定了原来

的体积而获得一种新的体积。因此物质概念不仅限于体积，它是具有能动性的，它能通过自身的互相作用而运动。

赫尔岑运用人的感情来描述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他写道，在自然界这个既无忏悔也无期望的永恒的实在世界里，生物在发展中不断蜕去过时的形式，并且发现自己昨天还非常合适的机体今天就已经不行了。

黑格尔怕触犯普鲁士王国反动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相勾结的政权，妥协地把“变易是万有的基本性质”改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有个终点，把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政体美化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花冠。赫尔岑反对黑格尔半途而废，没有把辩证法的革命精神贯彻到底的作法。他写道：“历史是一部承续的衔接的史诗，它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戏剧”，充满了革命和斗争。他反对把任何一个剥削制度神圣化，合理化，指出资本主义已走向下坡路，垮得这样快，没有复兴的可能，它一定会被更合理的，更高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所代替。

早在 1842 年，赫尔岑就说过，阶级分化“这种各趋极端的现象，是人类生活发展的现象之一，这个现象好比脉搏，所不同的是脉搏每次跳动一下，人类每次前进一步”。

赫尔岑批判形而上学者在量变和质变的关系问题上用量来化除质，否定质，不理解新质和旧质存在根本区别的错误观点。他指出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因此而把动物、甚至人都归结为机器。而笛卡尔也是从这种极端机械论观点出发，得出了动物是一架水力火力两用发动机，它依靠杠杆等机件来动作的荒谬公式。赫尔岑进而强调量虽然不包括质的一切因素，但它是一切存在中最本质的一种质。

赫尔岑拟人化地论述了辩证否定原则。他写道，否定从其所否定的东西、从过去的东西中取得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否定决不会因为感恩而宽恕它，也不会因为憎恨而消灭它。他认为事物是通过否定而运动、变化的。他把否定比作一把火，它烧毁存在物的堡垒，其本身却依附于被燃烧物而存在。

下面是赫尔岑描绘否定就是扬弃过程的生动画面：错误莫大于抛弃对现在有益的过去，仿佛这个过去的发展是座外在的台榭，毫无一点内在的价值。如果真的这样，那末历史实在令人气愤，它永远是牺牲活物来祀奉将来；人类性灵的现在里拥有并保藏着过去的一切，过去并不因为现在而消逝，却在现在中间发展它自己；往事不会消失在现今里面，它不会为现今所代替，反而它倒充满了现今的气氛；消逝的只是那虚幻的、非本质的东西，其实这种东西本来也就不曾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它生下来就已经死了；可是真实的东西却永生不灭。无怪乎诗人都借用大海譬喻人的性灵：在它的深处保藏着往时掉在它里面的各种珍宝，其中有些软弱的东西，禁不起有盐质的海浪的浸蚀，便无影无踪地溶化掉了。

赫尔岑从否定之否定原则出发，指出当时诞生在封建废墟上的资本主义绝对不是永存的世界。任何一种丹方，无论欺骗或暴力，奴化或暴政，戒严、共和、行善、均田都挽救不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赫尔岑赌咒说通过半封建的农村公社而过渡到的空想社会主义比君主制获胜的机会多，社会主义是世界史的第三卷。

关于 1848 年法国革命，赫尔岑这样设问：“这一次的流血会有怎样一个结果？”接着又自问自答：“那谁也不知道，但是不管结果怎样，在这一场疯狂、复仇、争执、报复的烈火里，足可以叫那个排挤新人、阻碍新人的生

活，干涉未来的存在的世界倒下去——这再好也没有了，因此：大混乱和大屠杀万岁！死亡万岁！升起那未来的旗帜来吧！”

赫尔岑入木三分地揭露资产阶级既无伟大的过去，也无未来的前途，它应付不了胜利的局面。“作为煊赫的贵族与愚鲁的平民的后裔的资产者，一身兼备两者最显著的缺点，却丢掉了他们两者的优点。资产者的阔气有如缙绅，但是又吝啬得像个店东。”

这位革命思想家还把“小型革命”、“点滴改良”和“共和政体”都比作不足以撼动社会制度根基的西塞福式的运动（西塞福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皇帝；他因为触犯上天而遭天怒谴责，罚他把石头运到山顶上去。但是他每次运石上山后，石头都又自动滚下山去，他只好再运一次……后人常以此来借喻徒劳往返的劳动。——编者）。因此人类不能走狭窄的泥泞村道，而必须走清理过的宽广的坦途。

费尔巴哈主张人类之爱，而赫尔岑批驳道，你们该要求的不是对人类的爱，而是对妨碍一切发展、横在路上阻碍前进的东西的憎恶，“用一根粗绳子把发展和自由的全部敌对者捆起来，像这些敌对者捆犯人那样把他们捆起来的时候到了”。

这位像一团生命的活火那样的战斗者于 1855 年在《由彼岸来》一书中给自己的儿子献词：“宁愿与革命同归于尽，不愿在反动的收容所里苟安偷生！”

赫尔岑不像德国唯心论者那样，把辩证法当作逻辑练习，也不像诡辩派和中世纪的繁琐哲学那样，把它当作疑难与奇谲的诡辩。他断言辩证法绝不像形式逻辑一样，除了抽象的同一之外，不能给人提供新的知识和方法。他强调辩证法必须像代数学一样，发现并解决事物的矛盾，提供新的认识事物的知识和方法，指导人们消灭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应当指出，赫尔岑主张对立面的调和，没有说明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转化，把对立面的斗争看作是辩证法的核心，科学地论证量变质变规律，这表明他的辩证法仍然是不完善的，不彻底的。总之，赫尔岑的辩证法在结构上是紊乱的、残缺不全的。这些是它的局限性。

3．唯物史观的萌芽

“经济变革在其基础的坚实上，比一切宗教的和政治的革命有着无限的优越性。”

——赫尔岑

赫尔岑在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经验和思辨的结合为主要内容的认识论理论。

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论者，赫尔岑首先批驳了天赋观念论。他强调哲学如果不善于承认和理解经验，而更糟糕的是认为即使没有经验也行，那么它就会冷酷得像冰块一样，森严得不近人情。

赫尔岑主张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批判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他强调人类的理性完全具有揭露和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把真理比作时间的女儿。她准备在勇敢的人面前倾吐一切，听从那想要占有她的人的支配。赫尔岑坚信人的理性不会半途而废，它要探索不止，直到发现真理。

在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前提，把感性直观看作是思想的唯一先驱的同

时，赫尔岑还坚持认识由经验和思辨两个阶段构成的辩证法。他把经验和思辨看作是密切相关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赫尔岑把经验和思维比作马德堡半球。马德堡半球是一种进行大气压力实验的仪器，由于这种实验最先在德国的马德堡城进行，故取名马德堡半球。实验时把两个只有外壳的同样大小的金属制成的半球体拼合在一起，再设法把中间的空气完全抽出。这样，由于外部受强大的大气压力的压迫，两个半球就紧紧地扣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球体，就是用几匹马那样大的力量也无法把它们拉开了。在赫尔岑看来，经验和思维就是这样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无坚不克、无微不至的强大认识武器。他还批评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的人说，无论是综合还是分析都不能引至真理，因为它们好比是一个盾的两个方面，如果把它们当作两种孤立的认识方法就要铸成大错。

在驳斥经验论方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的同时，赫尔岑把感觉经验材料只看作是最初的几片砖瓦，它的用处是作为理性概括，也就是思维的材料。

赫尔岑早在《论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中就曾谈到认识，当然是以正确方法为指导的认识，能够为我们提供基本正确的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如果没有这种观念，人类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状态，而早就在最初那几个发展阶段上殒灭了。

19 世纪初风行德国的科学上的教条主义受到了赫尔岑的尖锐批判。他指出教条主义者跟书呆子是一路货色，他们在科学上只取出一些字母，却阉割了它活生生的灵魂，把科学原理变成了脱离实际的“ 高跷上的真理 ”，对于任何时代，任何一代人都适用的真理。教条主义者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而不愿大胆地、不畏艰险地探索新的真理。

赫尔岑揭示教条主义者不习惯于真理的永恒运动，不承认对一切原理的否定，不承认这种运动和否定有如“ 真理的蛇壳，真理从其中蜕化出来，一天比一天更自由 ”。教条主义者每走到途中的一站都以为到达了旅途的终点，他们死守个别章句的字面含义，因而也就不能领略整部鸿篇巨制的真正主题。

当然，赫尔岑的认识论也是有其缺陷的。他不理解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主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以结成统一的真理观。他认为“ 凡是合理的，人们就承认。人不寻求另外的标准。理性的证明——这就是终审法庭 ”。这就是说，他的认识论带有唯理论的片面性，把理性看作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

正如其他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那样，赫尔岑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没有能够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以科学艺术的发展为基础的人类思维的发展。但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也提出了旨在说明革命现实的超出唯心史观的观点。也就是说，在他的历史观中，包含着对于许多重要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见解的萌芽。

赫尔岑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看作是思维史，认为思维史是自然史的继续，撇开历史的发展，既不能了解人类，也不能了解自然界。这两种历史的不同在于，自然界没有记忆，对它来说，无所谓过去，而人身上却负载着他自己的一切往事，因此，人不仅是他个人，而且是世代继承下来的人。历史的思维是人的世代相传的活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知识和思想，它只是该时代思维的总结。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赫尔岑在《致老友书》中，也接近了这样的唯物史观原则：只有在研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谈到经济变革的途径，对待它的各项条件的态度也都应该比宗教和政治革命更具有无限的优越性。经济变革从模糊不定的痛苦和不满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落在现实的基础上。其他一切变革总是把一只脚踏在幻想、神秘主义、宗教观念以及不合情理的“爱国主义”和法律等成见上。因此，他提出把血腥的宗教政治问题归结为人民的经济问题这一他那个时代的总任务。同时，他还指出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又妨害了经济制度。

赫尔岑把欧洲发展史看作是野蛮人和罗马人，教皇和皇帝，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封建主和人民，沙皇和封建主，沙皇和公社，沙皇和人民之间不断的斗争史。他坚信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变革不可避免，下一步的社会发展将是资本统治的终结，所有权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正如不久前贵族封建主义的统治宣告终结那样。他再三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胜利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相信“思想不会中断”。

在《往事与随想》中，赫尔岑认为，历史事件、当时的思潮、个人家庭生活状况等等环境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个性的形成。他还强调，不仅环境影响个人，个人反过来也应当积极地影响环境。他指出人应当在社会环境中求得发展，如果“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狭小的圈子里，穿着中国式的小鞋，肯定会步履维艰，寸步难行，把双脚弄成畸形”。

赫尔岑试图用个人与社会同步发展的思想来解决伦理问题。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呼应，达到了 19 世纪进步思想的水平。他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使道德名存实亡，提出应当把个人主义发展为“理性的个人主义”。“如果要摒弃掉人心中的个人主义，无疑等于要弃掉他的源头活水、他的根基、他个性中的盐（耶稣用世上的盐来比喻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编者）。”记得有一位可敬的道德家训练自己的马改掉吃东西的“个人主义”习惯，结果马一旦养成不吃东西的习惯，很快就死掉了。赫尔岑把道德看作是一定时期人们对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历史意识，它为人们所承认，使生活充满情感。这种把道德解释为决定于社会政治现象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无疑是 19 世纪伦理思想的重大突破。

在说明家庭生活问题的时候，赫尔岑提出了许多人道主义观点。他说，与丈夫相比，妻子担负着较多的家务；其实丈夫也应当这样对待妻子。母亲的称号表明妻子比丈夫能干，作为母亲的女性比作为父亲的男性伟大，女性完全应当引以自豪。母亲所从事的最初教育是一项极其伟大极其重要的社会事业,如果把女性的生活范围限制在卧室或厨房,怎么能够干好这项事业呢？他由此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赫尔岑用咄咄逼人的语气愤怒斥责现存社会制度保护买卖婚姻法律对出嫁妇女的心理毒害。他说，妇女不爱也不可能爱她的配偶，这毫不足怪，因为，她慈祥的双亲曾跪在她的面前，央求她为保全他们的财产和名誉去忍辱负重，去出卖自己的肉体。赫尔岑对此感到十分难过。

总之，赫尔岑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的内容上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哲学的发展水平。然而他出国之后很少研究自然科学，没有留心当时西欧的工人运动，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分析。这就毫无疑问地妨碍赫尔岑成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者。正像列宁所正确评价过的那样，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17页）

4．妙趣横生的政论艺术

赫尔岑“作为政论家来说，迄今为止我们当中无人可以与之媲美”。

——普列汉诺夫

同自己的哲学著作相比，赫尔岑的政论作品更能证明他是出类拔萃的语言艺术大师。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以诗人的睿智……把思想转化为生动的形象”。他首先关注的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具有卓越的政论才能。他的作品笔锋犀利，影响深远。列宁高度评价赫尔岑，认为他“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

赫尔岑善于运用书信、特写、小品、讽刺、短评等各种体裁，使自己的政论风格富有表现力。他具有无与伦比的高超的语言技巧，运用俄语既合乎规范又灵活巧妙，驾轻就熟，词藻优美，内容丰富，感染力强。

文学家应该投身生活，干预生活，而没有权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赫尔岑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一个青年人的随笔》中写道，我把自己投入周围环境，在与环境的格斗中展示我的全部心灵，在熔炉里一次又一次地锤炼它，我与人类共命运。他充满激情地宣称：“斗争就是我的诗！”

赫尔岑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崇拜《浮士德》的作者歌德，同时也与宫廷顾问歌德断绝往来，因为歌德在莱比锡战役期间埋头写喜剧，不再关心人类。他还不如一个尽到公民职责的士兵。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赫尔岑的作品才不仅从理论上吸引读者，而且具有极其强烈的感染力。赫尔岑自己说他从心中炽热的爱出发，付出非凡的精力，甚至是痛苦的眼泪，因冥思苦索而消瘦，热爱一切，把全部的爱献给真理，这样，科学也就成了抒情诗。

赫尔岑用清新的自然画面抒发了对自己的家乡、祖国和人民的无限深情。他写道，从孩提时代起，我就无比热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村庄。我真想用上几个钟头，斜躺在桦树或椴树底下，久久地凝望着栉次鳞比、微微发黑、十分简朴的小木屋，倾听着终日不绝的凄凉歌声，忽远忽近。林中的松枝散发出馨香的气息，田野中的谷物干燥房飘出缕缕清烟，就连干草也会使人觉得新鲜。我们的家乡地处北方贫瘠的山谷，然而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是多么感人，多么幽雅，多么亲切！

这位政论家指出，在蒙古大军占领俄国之前，无论在国力方面，还是在文化发展方面，俄国人民同西欧人民相比，都毫不逊色。只是从这个长达二百年之久的不幸时候起，俄国才被欧洲超过了。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促使赫尔岑成为无比勇猛的斗士，成为搏击长空的雄鹰，成为超群绝伦的政论艺术大师！

具有形象化的风格，这是赫尔岑的科学理论和政论文章的鲜明特点。别林斯基指出，只有像赫尔岑这样的艺术家，才能够在博学的前提下，运用事实作为基石和砖块，建造起形象美丽的大厦。

赫尔岑在《一个青年人的随笔》中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揭露了当时一个省

会马林诺夫市的社会现实。他对马林诺夫市的居民得出结论，说整个城市“ 都有三只眼睛在活跃着，其中两只眼睛盯住一个个外来的姑娘们，第三只眼睛盯着心术不正的狗彘一般的省长 ”。他把马林诺夫市民看作是俄国农奴专制制度可怕的不合理的伦理观念的牺牲品。他认为有罪的不是人，而是使人们变坏的环境，正像白化病是由于吸入北方沼泽地的空气，病毒侵入人体，使机体受损而造成的那样，患者本身是无罪的。

这位哲学家把真理比作美女。他说宗教的虔诚主义者、反对宗教的人、上层社会都在尔虞我诈，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寻找真理。但是戏还在演下去。而事实并不是演戏，有时真理也要把自己显露出来，使我们看到 “ 她那惊人美丽的身段。真理决不以虚伪的面纱来掩盖自己，她深知自己完全显露出来后的力量、价值和美丽 ”。

在论及科学也会出现同哲学一样坏的前景时，赫尔岑写道，这决不比失去了奥德赛的佩尼洛芭情况更好过一些（奥德赛是古希腊同名史诗的主人公、伊达克国王，佩尼洛芭是他的妻子。），无论是数学公式和图形，还是各门学科构成的栅栏，都无济于事。

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中用廖廖几笔，就勾画出封闭于自身圈子里的学者的典型肖象。他写道，这些占据着社会地位而在固定圈子里活动的学者们，“ 仿佛具有两个反刍动物的胃：他们任何时候也不去吃新鲜的菜，只是令人厌烦地反复咀嚼，他们在这种一再的重复中寻求满足 ”。

《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激起了社会先进分子和青年大学生们的热烈欢呼。赫尔岑把这看作是对自己劳动的最高奖赏，他说青年们津津有味地欣赏他的著作，就像吃糖果点心一样。

在长篇小说《谁之罪？》中，赫尔岑无情地嘲讽了佩戴安东勋章的政府顾问的虚荣心。他在运用监狱长和政府顾问的一段对话，勾画出这些当局者的全部迟钝和愚蠢后，醒目地指出政府顾问勋章所佩戴的位置安排得十分巧妙：“ 无论他坐着还是站着，从房间中的任何一个方位都可以看到他的勋章。”

赫尔岑在《制度的确立》一文中运用《谁之罪？》中首先出现的克鲁波夫医生的形象和奇特的“ 克鲁波夫理论 ”，猛烈抨击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说现在整个欧洲布满大医院，小医院，尤其是精神病院。

照赫尔岑看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是丑恶的、片面发展的市民社会，并不是理想社会。他在《终结与开端》中说，我毕竟十分幸运，虽然没听过玄奥的医疗学、病理学讲座，没有看过解剖图，但却在剧院这座特殊的解剖室里，得以观察市民社会的自我解剖，看到它患病、死亡、分解的演化过程。他指出：“ 患有严重的夜游症的欧洲从万神殿的屋顶跌入警察制度的泥潭。 ”

法国 1848 年革命时期演唱《马赛曲》的著名女演员拉雪尔的艺术造诣，给赫尔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向我们这样生动传神地塑造了拉雪尔的形象：我现在看到的是她那高傲的樱唇，灼热明快的眼睛，她那由于激动和愤怒而抖动着的身躯。她的歌声多么动人，充满对孩子的母爱之情。这嗓音俏悄地说出情话，仿佛斑鸠嘤鸣；但这嗓音又足以使敌人颤抖，仿佛母狮怒吼。

赫尔岑在《暴风雨过后》中再次盛赞拉雪尔演唱的《马赛曲》热情奔放、富有号召力，希望中隐含着失望的低吟。他写道，这位苗条、深沉的女演员没有化装，穿着白色的短衫，举止落落大方。她缓步走上台，默默地环视一下四周的观众，放开喉咙唱起来。这歌声极其悲壮，号召人们投入战斗，……

突然，从她柔弱的胸腔发出愤怒的呼喊：“公民们，拿起武器，用敌人的污血浇灌我们的耕地！”这歌声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女演员顿时赢得观众的赞誉。她跪下双膝，祈祷胜利，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噙着泪水，把战旗紧紧地贴在胸前。赫尔岑写道，拉雪尔只有在识破 2 月 24 日的骗局、目睹了 6 月的罪恶之后，才能唱出这曲感人至深的、用鲜血和仇恨谱写的战歌。

《北极星》1855 年第一辑发表了赫尔岑写的《转向我们》。它呼吁少数有教养的贵族支持《北极星》。它在开头引用了一个新奇的比喻：在罗马，妇女把新生儿放在父亲房间的门坎旁，以虔诚的心情等待着父亲把他抱走。只有当父亲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这个孩子才在这一瞬间成为自己的儿子。我们把第一辑《北极垦》放在俄国的门坎旁，以信任和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您愿意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吗？您在她的身上发现了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的《北极星》的余辉吗？

赫尔岑运用讽刺笔调怒不可遏地揭发农奴主。他痛斥农奴主是一群维护体罚制度、保护那洒满牺牲者鲜血的财产的打手，一群贵族出身的强盗，一群从母亲的怀中夺走孩子的吃人魔鬼，一群出卖少女的人贩子，一群招兵买马的邪佞之徒！他号召把这些败类拉出来示众。他把农奴主称作“在大俄罗斯土地上繁衍的群狼”。

《钟声》1861 年 6 月 15 日第 101 期发表了赫尔岑评述喀山省斯巴斯克县别兹得纳村发生的枪杀农民事件的文章。他写道，这份材料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起从阿拉克耶夫时期以来罕见的罪恶事件，“我们读它的时候大脑仿佛停止转动，血管的血似乎凝固了”。“我们已认不出俄国来了”，“这里血肉横飞，尸体成山”！靠波戈金的刺刀与文章维持的，坚持自由主义思想的“进步”政府舐完波兰人的血，又继续舐着，真可谓嗜血成性！

赫尔岑紧接着一针见血地揭露道，农民血泊中的“鹰隼”阿普拉克辛归来后，喀山省的贵族想宴请他，省政府机关的要员特鲁布尼科夫劝他最好不要赴宴。据说，特鲁布尼科夫假惺惺地提出理由：“不知怎么的，把香槟酒掺到血里，总有点令人难堪。”赫尔岑用尖刻的讽刺撕下了他的伪善面孔。赫尔岑朗声斥责道，令人遗憾的搀和！摘掉你们的假面具吧：露出野兽的牙齿和豺狼的嘴脸，要比硬装出虚伪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样子好得多。

《钟声》96 期发表了赫尔岑的《1861 年 4 月 10 日和波兰的屠杀》一文。他在其中运用了特别吸引读者的富有个性的叙事语言：“我们的节日竟然变得阴森可怖。我怎么也料不到，就在这一大会发生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悲惨事件，节目的灯盏上会撒上悲哀的泪水”。沙皇政府的《改革宣言》发表之后，赫尔岑还以为亚历山大二世能够迈出第二步。1861 年 4 月 10 日，为庆贺农民即将获得解放，“自由俄罗斯印刷所”举办了喜庆宴会。在宴会上，赫尔岑本想为亚历山大二世举杯，可是就在同一天发生了华沙流血事件，这使得他立即清醒过来。赫尔岑逼真地刻画出自己当时的心态：“我的手又垂了下来。华沙正在流血，我们的酒杯怎么能举得起来？伤口还没来得及包扎，尸体还没来得及掩埋，沙皇又犯下了新罪行！沙皇的名字使我们难以说出口，……我们空欢喜了一场”。赫尔岑在宴会上的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心弦。宴会更换了祝酒辞：“为波兰完全的、无条件的独立，为她摆脱俄国与德国的奴役，为俄国人民与波兰人民兄弟般团结，干杯！”

与赫尔岑同时代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安年科夫曾回忆起阅读赫尔岑哲学文章的感受。他对赫尔岑的超人智慧感到惊愕和不知所措。他说赫尔岑迅速把

握不同领域的能力甚至会使读者感到智力上的疲倦。赫尔岑的语言经常出现离奇的神来之笔和聪明绝顶的格言。阅读赫尔岑的作品要有许多知识准备，思维稍稍迟钝就不能保持与作者的思想交流。

曾在“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工作过的克利西耶夫，在《自由》中谈到了《钟声》编辑部的分工情况。他写道，赫尔岑让奥格辽夫组织财政、经济、法律方面的稿件，自己负责一般性的文章和杂俎栏。赫尔岑挥动如椽大笔，发挥讽刺才能，对此应付裕如。奥格辽夫在 1865 年 6 月 5 日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至于现在已经出版的《钟声》，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的文章或杂论会写得相当糟糕。我对自己所作的构思总是感到不放心，对你的构思则充满信心。”

普列汉诺夫在《侨民赫尔岑》一文中赞扬赫尔岑是无人与之媲美的政论家，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有一席最突出的地位。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批评史上也应有他的位置，他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转折时期最杰出的、最富有思想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四、车尔尼雪夫斯基：
俄国的“普罗米修斯”

1．《现代人》喉舌的主帅

车尔尼雪夫斯基充满了“对祖国的真正的爱”，“把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

——列宁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19世纪俄国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评论家、美学家和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28年7月12日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城的一个大司祭家里。他的父亲取自己的故乡平扎省钦巴尔县车尔尼雪夫村的村名为姓。父亲出身助祭，本来是一位中学教师。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同萨拉托夫市谢尔盖耶夫斯基教堂大司祭的女儿结了婚，并一下子当上了教堂的神甫。他博学多识，很有教养。他不惜重金，购置大量书刊，亲自教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车尔厄雪夫斯基的母亲也知书达礼，常常利用闲暇时间给孩子们教课。这就为童年时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阔知识视野，发展智力提供了良好条件。他读书成癖，手不释卷，聪颖过人，不到16岁就熟练掌握了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熟悉了波斯文、犹太文、波兰文和鞑靼文。1836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亲把他送进教会小学，其实也只是挂个名，他仍然在家里学习。

“我很早就成了一个藏书家和饱读书籍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这样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因而得到“书迷”、“蛀书虫”的美称。儿时的他性格活泼，爱好交际。天暖时玩棒球和击棒游戏，放风筝或追小狼，在街上和小伙伴们斗拳。冬季则在山坡上滑雪橇。

车尔尼雪夫斯基喜欢听农民运动领袖斯捷潘·拉辛和叶米里扬·普加乔夫的传说和斗争故事。伏尔加河上迈着沉重步伐、哼着忧郁曲调的成群结队的纤夫们的形象；因反抗地主而被押送到遥远地方去服劳役的农奴——带着沉重镣铐的犯人的形象；都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传体小说《序幕》中描述了自己在孩提时感到迷惑不解的图景。残废的老看门人只要大声呵叱：“畜牲，嚷什么？我非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一大群吵吵嚷嚷的纤夫便立刻静下来，四下散开。老百姓的逆来顺受已经使年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惊讶和忧虑不安。

184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考入萨拉托夫正教中学，先在低级班（修辞班）学习，随后升入中级班（哲学班）。他不满足于简单复述教科书上的现成答案和在课堂上学到的一点点东西，而是把时间用来摘录辞典中的词汇，丰富语言知识。他的语文教师称赞他的作文，说“可能只有大学教授才能就题如此发挥”。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中学作文中表现出来的独特见解有时也遭到教师的批评。中学时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哲学、历史和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他特别喜欢阅读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论文。学校为他准备的僧侣前程对他毫无吸引力，他渴望到大学深造，成为“有益于全人类的”学者。

一位中学时的同学这样回忆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拉丁文很好。五至十人

一群的同学走到他跟前，他为他们翻译一些难译的地方，作些解释。这一群刚走，另一群又来了，接着又是一群。同时还有人在喊：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什么这个地方用现在完成时？教室的另一角也在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从来不见他有半点不耐烦。

一个偶然事件动摇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父母为他选择宗教前程的决心。车尔尼雪夫斯基读中学时的一位教师又对他进大学产生了很大影响。184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彼得堡大学语文系。他原来准备献身科学研究事业，但当时的大学教师们肤浅的学术造诣，是不能让车尔尼雪夫斯基满意的。大学与其说是“高等学府”，不如说是一支“消防队”，其宗旨是使青年人的心灵不会由于知识的火星而燃烧起来，反对农怒制和专制主义。无怪乎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早知如此，我就不到这里来了。订购一百银卢布的书籍寄到萨拉托夫，我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于是，他只好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自学，并密切注视，认真思考俄国和西方的一切政治事件，同时受到进步青年和学生组织的影响。当时的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米·米哈伊洛夫、洛勃多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19世纪俄国解放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分子哈内科夫、为数不多的出色教授尼基坚科和斯列兹涅夫斯基（俄国斯拉夫语文学学家、人种学家）、伊·维坚斯基（俄国社会活动家）等人都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

为了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入学习研究了俄国和西方的文学、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哲学著作。1848年西欧革命事件和国内此伏彼起的农民暴动，使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人类认识已经取得的思想成果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经过改造，形成了自己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在1848—1850年的日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部问题在于“不让一个阶级吮吸另一个阶级的血”，全部政权应该移交给下层阶级（农民加日工加工人）之手。他“不可遏止地期待和渴望即将来临的革命”。他写道，没有革命，“没有震动，就永远不可能在历史上前进一步，这就是我关于俄国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给未婚妻的信中，用“只消星星之火就可以”燃起一场“大火”这句话来逼真地形容俄国当时的形势。

大学时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腼腆的、外表甚至显得有点迟钝的青年。他眼睛近视，体格并不魁伟，有时爱讽刺嘲笑自己的笨拙和犹豫不决。但正是在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的头脑里，竟蕴藏着如此广博的学识，非凡的才智，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和革命家所必备的高风亮节。

1851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在萨拉托夫文科中学任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这所一潭死水般保守落后的学校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引导学生阅读俄国诗人和作家普希金、果戈里和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们宣传革命思想，教育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还经常给学生们讲授历史知识,例如曾非常生动地讲述过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学生们对这位和蔼可亲的教师非常尊敬和爱戴，把他看作良师益友。而思想守旧的教师和校长则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极为不满，指责他破坏校风，违反制度，散布“危险”思想，“宣传革命”。校长还经常旁听，实则监视他上课。他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可能要遭到当局迫害。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道，学生的心与这位热爱他们的年轻教师的心终生联结在一起。在他朗读《狂人日记》时，让人感到他内心中多么痛苦，又是怎样地替人难过，这使师生们感动地流下眼泪。教师们也不再打学生了，甚至连摧残孩子们的学监，也不常拿起抽打赤身学生的树条了。

1853 年，在姨父的一个远亲的妻子家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当地医生的女儿奥尔加一见钟情。他对这位曾提议“ 为民主干杯 ”的姑娘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她活泼、快乐、异乎寻常的美丽。车尔尼雪夫斯基坦诚地对自己的未婚妻说，“ 我大有被判苦役的危险 ”，“ 天天都可能被捕 ”，“ 恐怕逃不出樊笼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1853 年 2 月 21 日的恋爱日记中记录了他们之间的一段扣人心弦的对话。他说，“ 我一定要去参加即将发生的农民暴动 ”，“ 无论是污秽也好，揭竿而起的烂醉的农民也好，杀戮也好，都吓不倒我 ”。奥尔加也毫不动摇地说：“ 也吓不倒我。 ”他向她讲述了赫尔岑的妻子的命运。赫尔岑坐了一年牢，妻子怀孕受到惊吓，生下的孩子又聋又哑，自身的健康也终身被毁。后来，赫尔岑又在法国被拿破仑逮捕，遣送回国，妻子闻讯后便昏厥过去。1852 年，赫尔岑的妻子英年早逝。这些话并没有动摇奥尔加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结婚的决心。1853 年 4 月，这位勇敢的姑娘把自己的命运同未来的革命者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第二个月，他们便迁往彼得堡。

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时代的好友、诗人米哈伊洛夫为奥尔加作了一首诗《肖像》：

和仙女一样，
她的眼神似闪电般地发光。
和活泼的波兰少女一样，
声音如银铃般柔和地响……
在她的跟前，
你决计不会去爱别的姑娘。

奥尔加赢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终生全部的爱恋。他欣赏她勇敢泼辣的精神。他喜欢乘着三套马车，响着铃铛，唱着歌飞奔，相互竞逐！她冒着风暴在海上荡舟。在遭遇洪水时，她女扮男装，划着船去为别人救漂流在彼得堡涅瓦河上的财物。

车尔尼雪夫斯基重返彼得堡后，曾在第二士官学校教书，并且给《祖国纪事》杂志撰稿。他于 1853 年底写完了《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篇学位论文，由于当局阻挠，直到 1855 年 5 月才举行论文答辩，1858 年才被授予硕士学位。该文充满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被进步青年视为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而反动报刊和贵族作家则猛烈攻击它“ 比一本最恶劣的书更坏，简直是一种恶劣的行为 ”。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著名的民主派政治家 Н · В · 雪尔古诺夫记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在科学界和文学杂志上轰动一时的论文公开答辩事件。他写道，一间用作辩论会的小教室被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这里也有大学生，但似乎更多的是局外人、军官和青年文官。非常拥挤，以致听众站上了窗台。我也是其中之一。

1853 年秋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为大诗人普希金于 1836 年创立的，由著名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古拉 · 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撰稿。涅克拉索夫慧眼识英雄，邀请他参加编辑部工作。他自 1855 年 5 月开始参加这项工作，起初负责《政治与文学评论》栏目，而自 1856 年涅克拉索夫

出国治病后，他便成了该杂志的实际负责人。

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的黄金时期。他同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一起，把当时俄国优秀的进步作家都团结在杂志周围，使它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有影响的合法战斗刊物，而他本人则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首领和灵魂。因为他们三人的名字都叫“尼古拉”，所以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被誉为“尼古拉三雄”作家团体。

1855—1856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发表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这篇文章实质上是 19 世纪 30—40 年代俄国社会思想史的缩写。他巧妙地躲过书报检查，恢复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革命传统，恢复了别林斯基生前在俄国报刊中的崇高威望。

车尔尼雪夫斯基针对沙皇政府“农民改革”的欺骗性和掠夺性，强调指出，“亚细亚式”的俄国专制政体是农奴制产生和至今存在的总基础和总原因，是造成一切悲剧的万恶之源。他在 1861 年改革开放不久便在《没有地址的信》（1862）中以惊人的洞察力出色地指出俄国必须彻底改革，人民必须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即实行人民革命）的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一针见血地揭露自由主义者只是要共和国和政权这些字眼，而不是要使下等阶级有吃有喝，能结婚，养育子女，供养父母。他们要把男子变成舍生拼死的人以至僵尸，让妇女出卖自己的肉体。他于 1859 年夏应涅克拉索夫的要求亲赴伦敦，使赫尔岑完全丢掉了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自由主义幻想，采取了与国内革命民主主义者共同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立场。

1861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组织全国农民起义的秘密的革命传单《农民的同情者致地主领地农民书》。它指示农民不要单枪匹马，而要团结食邑农民、国家农民和士兵同自己一起行动。

1861—1862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领导了建立秘密革命组织“意志与自由社”的筹备工作，有力地支持和指导了席卷整个俄罗斯的起义浪潮。俄国进步势力公认他为自己的领袖和导师，而反动势力则把他看作是一切动乱的罪魁祸首。警察对他严密监视，匿名信称他为“该死的社会主义者”，侦探向密探局告密。关于他的案件的起诉书写道：“若不驱逐车尔尼雪夫斯基，则将招来不幸和流血；这是一伙疯狂的蛊惑分子——亡命之徒。”

沙皇政府于 1862 年 6 月 15 日借口彼得堡偶然发生的两三起火灾勒令《现代人》停刊，并于 7 月 7 日深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囚禁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监狱。他在监狱中写下了塑造六十年代革命新人形象的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列宁盛赞它才是真正的文学，并在一个夏天里把它读了五遍。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怎么办？》中的贵族叛逆拉赫美托夫的形象看作是生活中的主角，是小说艺术力量和真理的化身。他把拉赫美托夫这样的人比作人群中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优秀人物的精华，原动力的原动力，盐中之盐。群众的力量和美好品质，欣欣向荣的生活，自由的呼吸都与这种寥若晨星的人有关。多不胜数的正直善良的人需要他们特别的革命毅力。

拉赫美托夫耕地，做木工，赶大车，拉纤，刻苦锻炼自己。苦力朋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尼基土希加·罗莫夫。［这是“老百性”对传说中的 19 世纪 30—40 年代伏尔加河上一个力大无比的纤夫的亲切称呼，他身高 2 俄尺

15 寸，体重 15 普特（约 246 公斤），一人顶四人干活，被人民视为自己的英雄。——编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用光芒四射的光明的美人在比喻人们在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活。赞扬她比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拉芙洛迪特、卢弗尔斯卡娅更美。

1864 年 2 月 5 日，沙皇政府根据伪造证据判决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七年和终身流放。同年 5 月 19 日，沙皇政府又以国事犯罪名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褫夺公民权死刑”。那是一个下着雨的早晨，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宪兵们带到梅特宁广场上竖有刑柱的高台上，胸前挂着一块写有“国事犯”的黑牌子。宪兵宣读了对他的判决，摘掉了他的帽子并要他跪下，然后在他头上折断一把剑，再把他扶起，并把他的双臂绑在刑柱上站立一刻钟。反动派想以此羞辱车尔尼雪夫斯基，但他却处之泰然。忽然，愤怒的人群中冲出一位姑娘，她把一束鲜花抛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姑娘当场被宪兵逮捕。接着又有几束鲜花落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身边。群众中响起“车尔尼雪夫斯基万岁！”的口号声……

第二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押送去西伯利亚服苦役，起初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矿场，继而在亚历山大工场。1870 年苦役期满后，他又被放逐到高寒荒僻的“天然监狱”——东西伯利亚的维柳伊斯克。1883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回到伏尔加河口气候奇热的阿斯特拉罕，在警察的监视下定居下来。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仍然写小说，注释译作，写家书，继续顽强地进行政治和理论斗争。

在阿斯特拉罕，车尔尼雪夫斯基患上了可怕的坏血症和严重的风湿症。正像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文学中的普罗米修斯”，“在鹞鹰似的警察有计划地折磨他的那个漫长的时期内……曾经高傲地忍受过”多么“深重的痛苦”。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造福于人类的神。因从天上窃火种给人类而被宙斯锁在山上。每天派神鹰啄食他的肝脏，但每次都又重新长成。他不向主神屈服，直到赫拉克勒斯杀死神鹰，解救了他。

1874 年受命劝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位官员曾记述道：“我把文书（事先写好的请求赦免书）递给他，他读过后说：‘我所以被流放，只是因为我的脑袋和宪兵首领舒瓦洛夫的脑袋构造不同的缘故……我断然拒绝递呈文。’我当时像一根木头似的站了三分钟。”

回到阿斯特拉罕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只能从事官方准许的翻译工作。1888 年，他还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第三版写了一篇非常出色的序言，但被禁止出版。1889 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到萨拉托夫。“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仍在勤奋工作，但仅仅四个月后，他就在 1889 年 10 月 17 日夜间被脑溢血夺去了生命。给苦难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的俄罗斯上空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囿于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科学分析，没有看到工人阶级在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上所负的历史使命，把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避开资本主义这个人吃人的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农村公社”上。

尽管如此，革命导师还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崇高评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后记中，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百科

全书式的社会科学家称为出色地证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破产的“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出版，第 17 页）。列宁这样赞扬他所爱戴和崇敬的这位先驱：“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赫尔岑更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尽管他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毕竟是一位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判者。”（《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99 页）

不仅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经济活动和立法》一文中还对未来社会作出了惊人的预测。这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的美好憧憬已经和革命导师描绘的蓝图，我们今天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人将逐渐使外部自然界完全受自己节制。劳动将变得越来越有成效，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轻松愉快的对生理要求的满足。人们的每一种要求都将得到充分满足，而满足这些要求的财富总是多于要求而有所剩余。那时没有人会为了这些财富而争吵，它们的分配一般用不着任何特殊法律。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德国的社会主义报纸《柏林人民论坛报》在他逝世后发表的讣告中高度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认为他真正地为东欧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像马克思为其他文明世界创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一样。保加利亚学者Γ·巴卡洛夫写道，在读到马克思的著作之前，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者就已经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了，他们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起步走向马克思主义，依然保持着对自己的第一位导师的热爱。

2．逼近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理论以及一切哲学家说是在它们所属社会的社会状况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而每一个哲学家都代表某一政治派别”。

——车尔尼雪夫斯基

由家庭影响而形成的宗教唯心主义观念，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但在萨拉托夫教会中学时期，这位少年的宗教信仰就已经发生动摇。他后来在自传中说我早就开始藐视它的观念（宗教观念——编者）。但是宗教信仰在少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目中，仍然是有力量的，因为它已经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主要的是儿子深深尊敬和爱戴的父亲有着真诚的信仰。在发自彼得堡的致亲人的信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激烈批评一位大学教授的“复活节演说”和“毫无意义的夸大之辞”，说这使大学生们产生怀疑甚至“心里不信神”。摆脱因循守旧的宗教观念束缚的思想斗争，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在大学时代，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哈内科夫相识前后形成的。最初他认为黑格尔所宣传的真理像火炬一样照亮了一切，但不久他就深刻地指出黑格尔“是现状和现实社会制度的奴仆”。以后，他成了费尔巴哈的信徒。他称费尔巴哈为自己的“宗师”，说“读了费尔巴哈的著作，就能知道我的世界观的一般性质。”他追随费尔巴哈，把人作为自己唯物主义的基础，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人本学”或“人本主义”。

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哲学研究的中心目标却是创造一种能够代表劳

动人民利益，反映他们要求的哲学体系，他称之为平民哲学。这才是其人本主义哲学的实质。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的开创者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这样赞扬自己的这两位前驱：现在，我们祖国的精神生活第一次产生了这种能够和欧洲的思想家并驾齐驱，而不是以往那种只当他们的学生的人们。自从我们的代表独立地批判黑格尔体系以来，这个运动已经不受任何权威的支配了。

这位哲学家把哲学定义为解决科学中最有普遍性问题，即形而上学问题，例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论。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已经接近于我们现在的观点。

车尔尼雪夫斯基揭示唯心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于人们把只为主观所有的而为客观所没有的东西强加到自然头上。他们把自然界看作和人类社会一样，河流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树林好像人群一般。他们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思想的体现”。而劳动者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必须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来理解现实，唯物主义不但表现了劳动者利益，同时也反映真理。

与费尔巴哈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每一位哲学家往往都是当时为了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上占优势而进行斗争的某一个政党的代表者。即使是所谓“真正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也浸透着体系的创立者所属的那些政党的精神。他极其中肯地评论黑格尔是个中庸的自由派，黑格尔所作的结论非常保守，但是他一向采取革命的原则来反对极端的反动派，同时希望作为自己推翻衰朽旧时代的工具的那种革命精神得不到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则从理论上反映了俄国贫苦农民和广大劳动者力图摆脱封建专制和农奴制度的政治要求，是其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俄国炽热的阶级斗争中把其“宗师”的唯物主义向前大大推进了。他把人本主义同农民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力图用得出的结论指导革命实践。

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认为应该把人的活动的每个方面看作是从头到脚都包括在内的人的整个机体的活动。他一再强调人的自然本性。但是他把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思维对人脑和人的肌体的依赖关系。这“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列宁全集》第 55 卷，第 58 页)。

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这部主要哲学著作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正确地谈到，哲学所看到的人，和医学、生理学、化学所看到的一样，在人身上看不到任何二元的东西。他认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自然规律也就是物质本身。自然永远照它自己的规律继续运行，不知有人和人的事情，不知有人的幸福和死亡；自然规律可能而且确实常常危害人类和人类事业；但是人类的一切行动却必须以自然规律为根据。

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人的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的生活活动，如衣、食、住、行；另一类是人的心理活动，如思想、感情、愿望等精神活动。这两类活动的关系可以归结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生活活动、物质活动是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的基础，而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则是由生活活动、物质活动决定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谈到物质世界的统一是多样化的统一。例如一块冰有硬的性质，又有发亮的性质；一棵树有生长的性质，又有可燃的性质。这说

明在一个对象内结合着一些在种类上完全不同的性质是事物的普遍规律。

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无论天体的奇观何等奥妙，无论自然的图景是多么壮丽，无论天文学所引起的情趣是如何高雅，无论自然科学是怎样诱人，而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有趣的却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关于人的科学。

另外，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像许多机械唯物主义那样，狭隘地把具有一定质量和广延理解为物质概念的主要内涵。他们没有看到运动才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是极其尊敬的，他甚至声称：“我们是黑格尔的为数很少的信徒。”他指出黑格尔辩证法跟真理实际上是十分接近的，真理的某几方面已经被这位思想家以真正惊人的力量表现出来了。他同赫尔岑一样，把它称作是“革命的代数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也敏锐地发现黑格尔是不彻底的，他每一步都自相矛盾。他的原则是非常有力的，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可是结论却是狭窄而渺小的。

作为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继承和发展黑格尔辩证法原则的同时，推翻了黑格尔虚伪的结论，即向封建专制制度妥协的结论。他用辩证法思想来论证旧的社会制度的灭亡和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规律性，论证劳动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俄国现存的农奴制度是一定要灭亡的，一定要被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车尔尼雪夫斯基尖锐地批判黑格尔认为思维可以不要头脑，离开人的头脑可以进行“辩证的思维”的观点。他指出这种无头脑的思维是神秘的，荒谬的，生机勃勃的真理只能存在于有血有肉的头脑中，绝不会存在于无头脑的空洞的唯心的思辨中。他批评黑格尔牵强附会，烦琐论证，更接近于 17 世纪的哲学家，甚至更接近于经院哲学家。他在日记中写道，黑格尔“是一个事物现状的奴隶，是一个现存社会制度的奴隶”。

车尔厄雪夫斯基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看作是普遍联系的，他强调不能说石头和植物，无机界和有机界彼此绝对无缘，一切物体都是由相同的物质元素构成的，因此它们都具有统一性。自然界的各个领域之间根本不存在绝对严格的界限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同一领域内的各个具体事物之间也没有非此即彼的绝对界限。例如植物和动物同属于有机界，人和动物同属于动物界，它们的关系都是如此。她还根据生物学所提供的材料证明，在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存在着很多的中间阶段，过渡阶段，有的东西之为动物还是植物几乎毫无区别，因此很难断定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值得重视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关于对立力量斗争的思想。他写道：“全部生活就是两极化，在磁学、电学、牛顿定律中，你们到处都可以看见两种竭力向对立的方向分化的力量。”他把对立力量的斗争看作是自然界一切现象发生的原因。

量变质变规律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研究较多的一个领域。他举冰的例子阐明量变过渡到质变的原理，他写道，冰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它具有很少热量时，它便成为固体——冰；热量较多时，它便成为液体；热量很多时，便成为气体。在这里就表现出：量的差别过渡到质的差别。

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度评价“化学差不多是我们这一世纪至尊无上的光荣。”他立足于化学王国取得的成就，证明事物性质的不同是由构成它的元素的数量不同决定的。化学元素按照一定量的比例化合之后，能产生出这些元素原来所没有的新的性质。他举例说，氢和氧按一定的比例化合成水，水

有很多性质是在氢和氧中所没有的。

完全否认动植物中存在着进化和种的变化的法国生物学家居维叶的“灾变论”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判。他说不仅动物的个体在发展变化，而且整个种也在发展变化。他深刻地揭露居维叶是拿破仑希望使之在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思想倾向在自然科学中的代表。他盛赞达尔文（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达尔文的天才著作《物种起源》对于摧毁居维叶的“灾变论”起了决定性作用，引起了生物学上的变革，并将对今后科学的发展起巨大作用。

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辩证法思想还存在抽象性、不彻底的缺点。例如他认为植物和矿物、石头等无机物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组合，因而它的化学过程的进行要迅速得多，复杂得多。无机物和植物之间的差别就像小草和大树之间的差别一样，是数量上、程度上，而不是基本特性上的差别。他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只看作是量的简单积累，例如树木和无机酸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组合的复杂程度不同。这是像 2 与 200 之间存在的那样的数量上的差别。

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极为荒唐地认为，牛顿在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时神经系统内所发生的过程和鸡在垃圾尘土堆里寻找谷粒时神经系统内所发生的过程的理论公式是同一个公式。在这些情况下，他严重忽视了事物在质上的千差万别。

黑格尔和谢林（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所发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高度评价。他写道，发展永远遵循同一规律，即发展的最高点在形式上恢复到发展的原始起点。不言而喻，在形态相似下，其内容在终点比在起点则是无限丰富和无限优越的。他还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论证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关于越过资本主义，而在村社土地公有制基础上逐步过渡到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主张。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1848 年法国革命失败之后这样写道，多次的个别交战就这样失败了，但是，结果仍将是拥有更大的、逐年增长的力量的那一方取得胜利。他坚信人类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必将战胜腐朽的反动力量，因为发展的规律是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

车尔尼雪夫斯基举例说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过程是否定之否定，沿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条上升的路线进行的。他认为物体的气体和液体状态是组成我们的行星以及行星上的生命的出发点，以后产生出植物，再后则产生出动物，其后又经过漫长的发展阶段，经过哺乳动物的最高形式而发展到人。

与费尔巴哈完全抛弃黑格尔辩证法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其采取分析态度。他的辩证法思想使其唯物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并且优越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它比马克思主义以前所有的唯物主义派别都更加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

在认识论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感觉的产生必须有引起感觉的客观对象（外界物体）和感觉主体（有感觉的生物）。他举例说我们看到了一棵树，而另一个人也看到了这棵树。如果我们仔细瞧瞧他的眼珠，那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眼珠上出现的树同我们所看到的树是完全一样的。前者（感觉，即客观对象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映象）是后者（客观对象）的“真实副本”，“正本和副本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客观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不可知论是

毫无根据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举例说，当我感觉到左臂痛时，同时我也就感觉到有一只左臂，同时我也感觉到我存在着，而这左臂就是我的一个组成部分。感觉是外界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引起机体内部状态改变而产生的。他关于感觉有机统一过程的描述大大丰富了唯物主义的感觉论。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谈到感性认识必须上升为理性认识：如果科学只叙述事实，而不提出原则，思想将会何等乏味啊！但他把思维只看作是组合感觉材料，没有看到它和感觉之间质的区别。因此他甚至不同意只有人才有思维这种流行看法，竟然神话般地说什么人有进取心，马也有进取心，动物也会议论，狗也会进行三段论推理。可见他不懂得思维只是人脑的属性。

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遭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有力驳斥：被康德弄糊涂了的人，已经糊涂到了他们不知道太阳是否真正存在，或他们只是“觉得”太阳似乎存在的程度，——这些人当然完全不知道牛顿是否对了。他把那些高谈柏拉图和康德哲学的自然科学家逼真地比作一个坐在树枝上用劲砍伐这根树枝的农夫，因为他们恰恰是在挖掉自己的科学根基。他深刻地揭露康德的“直觉的先天形式”是康德为了捍卫意志自由、灵魂不死、上帝存在、关于世间众生幸福和他们来世美满生活的神旨而想出来的。康德反对狄德罗依据自然科学，依据数学，却把全部自然科学打得粉碎，把一切数学公式化为灰烬，而手都不打颤。

列宁极其重视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左面，即从唯物主义方面对康德进行的批判，并把它收进自己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作为补充。

车尔厄雪夫斯基从不否认个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他举例说明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以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温度计告诉我们，温度上升到多少度水才会沸腾，降到多少度水才凝固。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有了这种新知识，我们过去的知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过去我们只知道水沸腾时很烫，而凝固时很冷，这个不确定的认识仍然是真理。新知识只是赋予它过去没有的确定性。化学给了我们全新的知识：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我们现在知道了水的成分，但水还是以前的水。因而以前关于水的知识现在都仍然是可靠的，这些知识发生的变化仅仅在于增加了对水的组成成分的规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形象地把在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上人们对事物的真理性的认识比喻为真理这棵大树上的一个细胞，把每个真理比喻为真理长河中的一个浪花，拥有无数贵重物品的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认为它只具有相对意义。

对于认识不断扩展的过程，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这样用实际例子加以说明。他说如果我们左手痛，我们就有了关于左手的感觉和认识，我们就会有对与左手相对的右手的认识。如果我们有了对双手的认识，我们就会有对生着双手的身体的认识。如果我们有对我们身体的认识，那么我们就会有对它所穿的衣服的认识，也就有了对它所吃的食物的认识，有了对它所喝的水的认识，对做面包的小麦、对准备面包的器皿、房屋、种植小麦的田地，取得建筑材料的树林、砖场、石坑等东西的认识……这样，人们从左手痛开始，一步一步地达到对无数对象的认识。

“雨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此为例阐明了真理的具体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无法对它作出肯定回答，因为要看具体情况。如果问：“播种之后下了五个小时的大雨，这场雨对庄稼有好

处吗？”那就可以肯定地回答：“这场雨是十分有益的。”同样如果问：“在同一个夏天，在开始收获的时候，下了一个星期倾盆大雨，这场雨对庄稼是有益还是有害呢？”我们也可以肯定地回答：“这场雨是有害的。”

“‘实践’是一切理论的无可争论的试金石，在这个场合也应该让它作我们的指导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继费尔巴哈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明确地表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这是他在认识论方面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他写道，实践是个伟大的揭发者，它暴露一切欺人和自欺。不仅在实践的事实上，而且在感情上和思想上也都是如此。因此，现在在科学上，实践是对一切争端进行评判的主要标准。

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尚未清楚地理解到实践是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认识的基础。他把实践仅仅看作是改造自然的活动，而没有看到它主要是社会的实践。他认为实践只是日常的“实际生活”，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而不是改造世界的活动。他把思想也当成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检验思想自身的标准。这样他就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混乱之中。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的最高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思想及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以前最高成果的认识论作了高度的全面的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从 50 年代起直到 1888 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屏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人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 18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378—379 页）。

在一段回忆录里，列宁还极其亲切地写道，我是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开始对哲学唯物主义有所了解的。是他第一个向我指出了黑格尔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我是从他的著作中懂得了什么叫辩证法的。从那以后，掌握起马克思的辩证法来，就容易得多了。

不仅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思想还对当时俄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位哲学家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和结论，令人信服地证明唯物主义哲学和先进科学思想的有机联系。俄国生理学家伊·米·谢切诺夫的著名著作《脑的反射》（1863 年）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作者认为生命活动和复杂的心理现象的基础是神经反射活动的生理过程，这一理论成为俄国心理学家创立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前提。

3．用“斧头”拯救人民

“只有暴力才能从沙皇那里为人民夺得人权。”“只有斧头能拯救我们，除斧头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们！”

——车尔尼雪夫斯基

同许多旧唯物主义者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解决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时却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写道，虽然在历史的前台喧嚷激荡的是政治和工业，可是历史总在证明：知识是基本的力量，政治、工业和人类生活中的其他一切都得服从它。进步是以智力发展为基础的，它的基本方面就是知识的臻进和传播。知识运用了实际生活的各个领域，进步就这样产生了。进步的

基本力量是科学。他还认为剥削制度是由好逸恶劳的思想产生的。他说让我们以不劳动愉快，而劳动不愉快这个成见作例子。如果这一成见取得了统治地位，那么每一个人都要利用一切办法来保证自己不劳而食的生活，强迫别人为自己工作。一切形式的奴役和掠夺也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从经济中，从物质生产方式中，从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中来寻找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

但是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由于他与现实生活，与俄国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由于他善于应用辩证法分析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所以他的社会历史观中不仅有许多唯物主义因素和天才猜测，而且还有许多极其宝贵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1849 年给他的表弟贝平的一封信中也曾经写道,政治经济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即在科学和国家生活中确实是居于首位。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是哲学的主要支柱和源泉。他还曾指出物质条件在生活中几乎是起首要作用的，几乎是一切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他强调根据对经济因素的观察所得出的真理，对现代社会生活有着直接的实际意义。马克思说过，在现代经济学家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而其他人实际上不过是些普通的编纂者而已。

任何一个关注社会政治命运的人都不能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科学无动于衷。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基于这一点而酷爱历史，他不无偏颇地写道：一个对研究数学、化学、希腊语或拉丁语不感兴趣的人，一个不了解成百上千种学科的人，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有知识者；然而，只有智能很差的人才会不爱历史。

这位思想家生动地指出，探求真理的人不应当一想到会有什么结果就发抖。对于数学家来说，所得结果是正数还是负数都无所谓，只要它正确，就是可喜的。而研究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社会问题的人却不会不希望得出有利的答案，愿望对结论不可能不起作用，想到哪里，脚就必然会往哪里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虽然要比自然的发展过程复杂得多，但是它决不是随意的，而是遵循客观规律的。他同否认社会发展有客观规律的主观唯心主义社会学，如拉甫罗夫（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 意志自由论 ”，进行了激烈斗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断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在批判俄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契切林关于斗争只对社会有害的错误观点时指出，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未曾有过不经过斗争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他强调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和革命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平平静静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写道，让我也抽搐吧，没有抽搐历史就不会进步。难道没有抽搐，血液会在人体流动吗？心脏跳动不也是一种抽搐吗？人走路不也是摇摆不定的吗？人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前后左右的摆动，走过的路线是由一连串的摆动组成的。认为人类可以沿着平坦笔直的道路一往无前是愚昧的幻想，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社会分裂为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相互敌对的阶层和阶级。迄今的全部人类历史是一个被压迫阶级或阶层反对压迫阶级或阶层的斗争史。例如古希腊雅典

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罗马贱马与贵族的斗争，近代史上层——土地所有者，中层——工厂主和店主，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斗争。他强调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愿让出政权，必然采用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所以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为改变现存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必然会是异常艰苦、异常残酷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武装革命的形式。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有力地批判了鼓吹阶级调和的自由主义者和主张和平发展的改良主义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运用飞跃来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历史的发展虽然是缓慢的，但全部历史运动几乎都是一个飞跃接着一个飞跃地进行。

车尔尼雪夫斯基尖锐地指出整个欧洲是按照利益分成两半的，一半靠别人的劳动生活，另一半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前一半享福，后一半吃苦。尽管无产阶级在他的思想中还只是属于第三等级的一个没有独立出来的阶级，但列宁还是赞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

针对自由主义者宣扬理论与政治无关的欺人之谈，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现时的政治理论是在当前进行着的事件的影响下创立的。学术论著是历史斗争的反响，其目的就在于减缓或加速事件的进程。哲学是它出生的那个时代和民族的女儿。

作为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坚信历史发展中的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也认识到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形象地揭示历史的道路不是彼得堡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注定要穿过田野，有时积满尘土，有时遍地泥泞，有时遇到沼泽，有时进出丛林。谁要是害怕蒙上灰尘和弄脏靴子，谁就不要参加社会活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揭露俄国农奴制把整个社会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它已经腐朽了，必须让位给以农民地权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他在对当时自由主义改革者设计的赎买方案所作的注释中，极其愤慨地揭露道：“不，最好是农民们既不要土地，也不要庄园。……我们去抢他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剥去一切，直到最后一件衬衣；最好让他们赤身露体，脖子上只挂着一个十字架去沿街乞讨，——但在这种情形下，总有一天他们还是要起来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他还用形象的比喻来表达自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认为贿赂不是孤立的罪行，而是农奴主赖以生活和炫耀的那种秩序的必然结果。必须拔掉生长这朵花和无数类似的花的这个根子。这种为躲避书报检查而采用的伊索寓言手法的锋芒所向——消除专制农奴制这个大大小小祸害和虚伪的总根源是不言而喻的。

在自己的政治小说《序幕》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用墨如泼地勾勒出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他以尖刻的笔锋嘲讽了农奴主贵族恰普林伯爵。他写道：一个矮矮的、还一点不见老的、人样的庞然大物滚进门来。的确，它不是走，而是滚，膝盖高高地抬起，费力地向一边甩出去，两只手从身体两旁远远向外张开，好像胳肢窝底下夹着两个西瓜似的，整个身体滚动着，腆着个大肚子，脑袋也滚动着，两片肥厚的嘴唇一直耷拉到肩上，流着口水，半张着嘴巴，不断地一收一缩，每当大声喘息和呼哧时就扩大开来，两只呆滞的小眼睛里浮着一层脂油。

恰普林伯爵的言行和他鲜明的丑八怪肖象完全相称。他是肥得流油的屠夫，对造反者、革命者怀有刻骨仇恨。他是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草包，举止傲慢，饕餮成性。他把整个一个桃子塞进嘴里，啊呜一声，噗地把核吐了出

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比俄国农奴制度进步得多。但他在肯定资本主义在发展工业、商业、教育和民主方面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也极其尖锐地指出，产生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和产品相分离。从这个根源产生出竞争、贫富悬殊、投机、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劳动群众生活日益贫困及其在政治法律上无权，在精神生活上愚昧等一系列恶果。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广大雇佣工人出卖劳动力，但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因此工人仍然像奴隶一样。

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虚伪性被车尔尼雪夫斯基揭露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在生存的物质资料上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独立的，尽管法律条文上宣布他们是独立的人。

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应该由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而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将是公社和集体所有制，其实质是使劳动者本人也成为主人。他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关系，使所有权和劳动权合二为一，使所有者和工作者统一起来，即每个人既是劳动产品的占有者，又是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才能培养劳动者对劳动的兴趣，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满足各种需要。他还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论证土地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曾经是一种进步，但在发展过程中土地私有制又必然要被历史发展更高阶段上的公有制，即社会主义所代替。

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把社会发展解释为“形式的更换”，即由低级向高级的过渡，由适应人们新的生活条件的新的社会关系取代旧的社会关系。他热爱新生事物，强调依靠新生力量，培育革命者。他指出代表新生力量的人们不指靠过时的东西，只有愚蠢和自私的人才会喜爱它并以此为满足，在死尸的周围聚集的只能是鹞鹰，在其中蠕动的只能是蛆虫。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完全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由封建农奴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他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因为当时俄国还没有能够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革命的工人阶级，而农民起义则缺乏组织性。在国际上也还不存在能够在俄国爆发农民革命时给它以帮助和支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所以当时俄国并不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是处在农民的、按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他的结论不是俄国本身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是从否定之否定这一辩证法规律推导出来的，因而带有某种程度的思辨性。

不过，正如曾经负责前苏联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日丹诺夫所指出的那样：“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中最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于赫尔岑的“俄国社会主义”。后者打算把宗法的农村公社原封不动地搬进社会主义。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认为村社土地所有制只不过是一种由土地私有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有制形式。同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不同。后者希望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爱”，资产阶级的“博爱”能够成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把革命，即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劳动者的政权看作是建立社会主义的途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向强调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他说俄国历史

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完全是靠农民的力量完成的。统治阶级和统治者在与外部敌人作斗争的关键时刻，或者是在内部发动政变时，都要借助人民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胜利之后，他们仍然欺骗人民，残酷剥削人民，甚至剥夺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他认为人民应当是历史事件的唯一有全权的法官。他写道，只有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志向才是有力的，只有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制度才是巩固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功绩在于，他在同时代当中比任何人都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培育了几代革命者，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土壤，对俄国科学和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赫尔岑“ 理性的个人主义 ”伦理思想的启迪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制定和论证了自己的“ 合理的利己主义 ”道德观，即伦理学说。他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中写道，人们根据经验知道，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设想，关心自己的利益要超过关心别人的利益，并且差不多总是用牺牲别人的利益、荣誉和生命来成全自己的利益。总而言之，每个人都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所有有理智的人在实际事务中总是持这种看法：利己主义是支配他们与之发生关系的每一个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

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损人利己的道德行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以不损人为前提的“ 合理的利己主义 ”道德理论。其最高原则是：“ 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全民族的利益高于个别等级的利益，多数等级的利益高于少数等级的利益。 ”这样一来，“ 合理的利己主义 ”实际上便成了以个人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而斗争为核心的道德理论。它不仅宣扬个人利益与全社会利益相结合，而且着重强调前者必须服从后者。显然，他的这种道德理论是为革命民主主义服务的，其目的在于动员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农奴制、并为根除私有制而斗争的行列中去。

早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整理自己在中学讲授俄语课的教案时就曾这样论述莱蒙托夫的诗《三棵棕榈树》：棕榈树死了。早晨，在原地只留下灰烬，而昨天它们还在那儿如此高傲地生长着，如此美丽地开着花。该可惜这些美好的棕榈树，不是吗？但也没有什么，它们本不会永远生长、永远开花的。那么，为人们的利益而死，不是比无益地死去更好吗？它们为人们的幸福而死，难道人们能不感激地回忆它们吗？生活是美好的，但最美好的幸福是如果需要，为了人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合理的利己主义 ”这一充满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道德理论，必然会哺育出一大批为社会、祖国、民族的利益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家、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他在《怎么办？》和《序幕》这两部著名小说中为读者塑造了一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英雄们的光辉形象。如《怎么办？》的主人公之一罗普霍夫说：“ 我觉得高兴和幸福——那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人人都高兴和幸福。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正是这样一位英雄，他为祖国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艰苦奋斗了一生。他的伦理学说培养并鼓舞了一大批同沙皇反动统治进行英勇斗争的青年革命家，甚至对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世界观的形成，也起过很大的影响作用。

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说毕竟是一种超阶级、超历史的人性论，

是一种缺乏科学性的道德观，它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它是以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利己主义为基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本不相信会有大公无私的人。他说，一般只需稍加留意那些表现为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感情，我们便可看到，它们的基础依然是那种关于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福利的思想，即依然是称作利己主义的情感。妻子对丈夫的死感到沉痛和悲哀，是因为妻子不能从丈夫那里再得到什么了，是以“我”为重点。同样，母亲对孩子死亡的悲哀和苦诉，依然是“我”、“我的”。可见在最真挚和最亲密的感情中同样很容易发现利己主义的基础。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个人利益是判断一切事物善和恶的标准，“我”就是一切道德判断的主词。那末他所讲的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一致性，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至多也只能是理论上的空谈。他把人看作是只具有一种本性的生物，断言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此他的伦理学说是同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不能相容的。

4．“美是生活”

“照普通人的理解”，面庞红润，体格健壮，这是“美人的必要条件。‘弱不禁风’的上流社会美人在乡下人看来是断然‘不漂亮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美学甚至是他批判唯心主义、捍卫唯物主义的第一战场，也是他对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改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他在《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篇学位论文的第三版序言中谈到，该论文是一个应用费尔巴哈的思想来解决美学的基本问题的尝试，他希望作一个应用在美学上的费尔巴哈思想的解说者。他所批驳的是当时还继续支配俄国文学的黑格尔美学理论。他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认为艺术问题“只是个战场，而斗争的主题则是艺术对整个精神生活的影响。”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在 18 岁时，就在给自己的表弟佩平的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让俄国在精神生活方面也作出它应有的贡献吧！”后来，他又说，文学和诗，对我们俄国人来说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这种情况，大概是别国所没有的。我们的文学，现时几乎集中了人民的全部精神生活。这也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是一位美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家的原因所在。

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黑格尔美学理论把美看作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它认为自然美是理念发展到自然阶段的产物，而艺术美是理念发展到精神阶段的产物，因而艺术美高于自然美。黑格尔的美学观点在 19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的俄国有很大影响。如自由派德鲁日宁、杜德希金等人就仿效德国唯心主义，攻击别林斯基的美学传统，宣传黑格尔以及费舍尔（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等人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他们认为在现实中，在自然界中没有真正的美。他们使艺术脱离生活，宣传艺术就是而且应当是目的自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理论。他们胡说美是理念在个别有限事物中的显现。在现实中的美只不过是我们的想象强加于现实的幻影。现实是丑恶的暂时的世界，是“毫无生趣的荒漠”。自然界是庸俗的，丑恶的，受必然性

压迫的。而艺术则通过个人想象“填补客观现实的缺陷”。

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理论相对立，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解决了美学的基本问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美不是主观自生的，不是体现在“最终形式”中的“绝对思想”，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命题，强调生活是美的本质。美是客观现实的特性。除了反映客观现实，艺术作品是没有其他内容的。不仅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还认为只有“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到有可能把“美学问题归纳到生活与世界的现代科学概念中去”。他指出但凡活着的东西从本性上看都恐惧死亡，恐惧不存在，而热爱生活，可见生活是美好的。这位思想家形象地描述美首先在生活中，我们感到美的是事物本身。高加索的卡兹别克山本身是雄伟壮丽的，大海本身也是雄伟壮丽的。

博大精深是几乎涵盖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车尔厄雪夫斯基思想体系的突出特征，其美学思想也不例外。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然启发着我们去思考。他赞扬人类的智慧和劳动能创造出比人类出现之前完善得多的世界。人们尚未住满的地球将会呈现繁荣景象。地球本来布满原始森林、美丽的草原和富饶的牧场。但是人类也在剧烈地破坏自然的原始状态，焚烧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牛蒡莠稗杂草丛生。然而这位先哲预言，人们脚下正无法遏止地消失着的荒野的原始美，必将由人的辛勤劳动才能赋予大自然的新的高级美所代替。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美的理解是不同的。正像鲁迅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红楼梦》中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多愁善感的林妹妹的病态“美”那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妙笔生花地阐明了美的概念对不同社会阶级生活条件的依赖关系，揭露了美的概念和审美标准的阶级性，指出了贵族和平民美学观点的巨大差别。他写道，在普通人看来，美好的生活就是吃好住好，睡眠充足。但农民把劳动包括在生活之中，不劳动而生活不仅不可能，而且叫人烦闷。辛勤劳动而不致精疲力竭的富足生活是美的条件。而弱不禁风则给乡下人不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一向认为消瘦不是疾病就是苦命的结果。劳动不会让人发胖，发胖是一种病态，是体格虚弱的标志。乡下美人不能有纤细的手足，民歌中关于美人的描写表现着精力旺盛和健康匀称的体格，这是生活富裕而又经常适度劳动的结果。上流社会的美人必然手足纤细，如果大手大脚，那不是长得不漂亮就是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上流社会美人的耳朵小，患有“偏头痛”这类“富贵病”。诚然，红润的脸色和饱满的精神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也仍旧是有魅力的，但是病态、柔弱、萎顿、慷倦，在他们心目中也有美的价值，只不过那是奢侈的，不劳而获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结果。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最重要原则是现实主义。他同别林斯基一样，认为文学艺术应当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他同时认为艺术的目的不仅在于“再现生活”，而且艺术还有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的最高使命。文学艺术必须成为人民群众争取理想生活的有力武器。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任何一项伟大的艺术创作——绘画、小说、雕塑、诗歌都必须对当代的需要作出回答。真正的艺术家必须以当代的思想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作家应该深入生活，他们对现实中产生的一切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

车尔尼雪夫斯基正确地阐明美就其产生和来源来讲是客观的，然而审美能力则又是主观的。因此，又可以把美理解为客观美的对象与主观审美能力的统一。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点是建立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基础上的，他所谓的生活（ЖИЗНЪ）既包含有现实生活即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意思，也包含有人的生命即自然本性的意思，因而他不能历史地看待生活的发展过程，未能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此外，他从人本主义原理出发批判黑格尔关于美的唯心主义概念并论证现实美（包括自然美）的第一性时，却对艺术美估计不足，认为艺术美永远低于现实美。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从整个西方美学史来看，他的美学理论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前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后　　记

承蒙三位主编，特别是周向军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几番具体点拨，历时数月，屡易其稿，总算可以搁笔了。首先应当感谢同仁们的鼎力协助。

诚然，即使是像赫尔岑那样出神入化的语言艺术大师，对于用生动形象的文笔论述严谨深刻的哲学主题仍有勉为其难、颇费踌躇之感。更不要说像我这样初涉哲学园地的人了。这里需要把握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亦即毛泽东所说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哲学的深邃内涵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和尚念经般的平淡文风固然同嚼蜡，而花言巧语、不知所云的哗众取宠亦不足取。这是需要我们大家长期共同努力去解决的一个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

穆志强

1993 年 3 月于山东大学